

第二章 治军能手

从严治军，以身作则在前；严肃军纪，国家民族利益为先；爱兵如子，鼓励官兵向上；恩威并施，铸造“西北军团”；官兵平等，开创旧军队之先；爱国爱民，本是中国军人本色；“练兵能手”，永在民国史传。

立志从严治军

1924年冬，陆大四期同学熊斌约我到南苑担任西北军军官教导团教官，后又当教育长及西北军第二师参谋长。1925年5月，冯玉祥调我到张家口担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检查处长。兹将我亲见的一些关于冯玉祥的事迹写出来，以供参考。

石敬瑭专程由绥远到南苑来打军棍

1924年秋，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曹锟、吴佩孚派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在热河抗击奉军。由于吴、冯间早有尖锐矛盾，冯于10月19日回师北京，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并把溥仪逐出故宫，西北军称之为“首都革命”。时熊斌任冯的参谋长兼南苑军官军士教导团团长，他让我去当教官。军官教导团的学员多是校官，军士教导团则是下级军官，最大的是尉官。我担任军

官教导团的地形测量课目。

我一到教导团就感到有些特别。举例说，喝酒不成，抽烟不成，下饭馆不成，嫖赌更是严厉禁止……各种不准多得很。

一天，熊斌告诉我，接到电报，说石敬亭（时任第四混成旅旅长，归绥远都统李鸣钟节制）要来教导团，不知有什么事。石敬亭外号“小诸葛”，是冯的大将之一，这次专程由绥远前来，必定有重要公干。

石敬亭来到教导团之后，马上集合全体官佐军士，包括所有教官都要站队。他突然从军士队中叫出三个人来，说他们某日晚间私出营门，一夜未归，违反军纪，奉命前来惩罚。这一来我们都发愣：连教导团团长都不知道，他远在绥远，怎么知道的呢？事后才知道，这三个学员偷偷出去找“暗门子”（暗娼），学员中有的冯派来负有特殊任务的，随时将情况汇报，冯得到这个报告，才派石敬亭前来南苑处理此事的。

当宣布每人打400军棍的时候，全场静肃，有人担心这400军棍如何吃得消。西北军打军棍原来有一个特点，要一棍一棍数着打，一点也不能马虎，要是你不认真打，就叫别人反来打你。我见到一般军队乃至衙门打人，都是“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十”，数得很快，十下也不过打五六下。西北军可不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十……”打一下数一下，还常常叫两个人互打，谁也不敢打轻，更不许卖人情。把这三个人直打得死去活来，疼得往花池子边滚，把砌的砖也撞倒了。打完就“革”，把三个人都开除，衣物立时扔出营门，石敬亭也就搭上车回去了。

我心里嘀咕，这比打贼还厉害，简直把人不当人，太残酷了！我问熊斌：“教官要是犯了错，也要打屁股？……我可受不了，我不干啦。”熊说：“你不要怕，不会打到你头上的。冯先生

对教官很尊重，见了面总是称‘先生’。他说过：‘你们要是犯了错，我是不敢打你们的’。你放心好了。”

痰桶里有烟头排长挨打

西北军第二师也驻南苑。某次冯玉祥到第二师视察，发现一个排长屋里痰桶内有个烟头，就问这是哪里来的？排长说是来了一个朋友。冯问是什么时候来的？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吩咐卫兵室把来宾登记簿拿来查看，没有人来过；又问站岗的卫兵，也不知道。冯就火啦，他说：“抽烟是个罪过，违犯了军纪，你就该说实话，承认错误。为啥还要说谎、拉扯朋友呢？”当即站队，把烟头给大家看，坚决命令不许任何人抽烟，当场叫人痛打那个排长。连长、营长也受到责罚。

连长逛窑子挨了80军棍

我在西北督办公署当检查长时，有一个保定军校的同学胡文彬到张家口找我，他有一个学骑兵的兄弟想当官，托我介绍。我对胡说：“西北军与别的队伍不一样，冯先生的军风纪特严，烟酒嫖赌样样都不许犯，差一点就要严办，要是犯了错，可没有办法，一点人情也不能讲。”我问他兄弟能成吗？他答应说没有问题，一定叫他严守纪律。我又劝他当个教官不好吗，可是他定要上部队，说是受得了。我就把胡文彬的兄弟介绍到张之江部下当连长，张那时是察哈尔都统兼骑兵旅长。

不到三个月，胡文彬慌慌张张地跑来找我：“二哥，你快救救吧！我那兄弟被抓到都统衙门去了。”据了解，他因去逛窑子，被张之江派人在窑子里给捆回去了。胡文彬要求不打，也不干啦。我说这是冯先生定的法律，不打哪成，不下也得打完以后再走人，千万不能先说不干，那更要多挨打。

我向张之江求情，念其新到部队，少打得啦，结果打了80军棍，打得皮破血流，在送院养好伤之后，才借辞退职。

谷良友喝酒受责

谷良友同冯玉祥原是在保定练军（绿营）一起当兵多年的老朋友、盟兄弟。谷到张家口找冯说：“你当督办啦，给我个官做做吧！”他想当团长，冯劝他不要做官：“西北军同老队伍不一样，严得厉害；你要是犯了法，我办不办？”并说，“我不是给你钱买了两顷地吗，在家种地吃饭不很好吗？”可是谷良友坚持要做官，冯就派他为歩兵团团长，驻防绥远丰镇，省得在张家口碍手碍脚；同时告诫他不能与地面人私相授受，有人送礼，千万不要收，最忌贿赂；又警告他不能喝酒，不能赌钱，并叫他把西北军的条规好好看一看。谷良友表示：“没有错，一定不犯。咱们盟兄弟，决不给你丢脸。”

谷良友这个人爱吹牛，说大话，老毛病改不了。1925年冬，为了决定对李景林（直隶督军）打不打的问题，冯由张家口到包头沿线视察军事力量。谷听说冯要西来，即在集宁大肆招摇说：“咱同冯督办从小一块当兵，是把兄弟，亲如骨肉……”怎么长，怎么短，大包大揽，“什么事都有咱老谷”。对地方上大小官吏、土豪劣绅等发号施令，筹备盛大欢迎。经过大家捧场，说地方上一切事“都要谷团长在督办面前美言几句”，谷更是飘飘然，得意忘形。于是地主、土豪们设宴先请他喝酒，冯的专车及时到达丰镇，谷抢先上车表示欢迎。冯见到他那醉醺醺的样子，很不高兴，冷冷地说：“谷团长有什么事吗？有事就报告，没有事就下车。”谷良友为了让士绅们看看他同督办的关系如何密切，偏偏赖在那里不肯走。后来一同到车站候客室内，地方上的头面人物都前来欢迎，谷良友得意地坐在冯的对面。冯又给他台阶下，

说：“谷团长没有啥事，赶快看队伍去。”谷仍不知趣，不肯离开。冯实在忍不住了，便问：“在座的（指部队官佐）有谁喝酒？”谷傻了眼啦，冯见没人承认，便命某处长挨个闻，这个人很圆滑，闻了几个人之后说：“报告督办，我有点感冒，闻不出来。”冯又叫军法处长张吉庸去闻，闻到谷良友面前，便说谷团长有酒味。冯瞪着眼对谷说：“咱早跟你说过没有？为什么硬要违犯军纪？”吩咐拿军棍来，就在候车室里打。谷比冯大，那时已有50多岁了，200军棍真打得够呛。

事后，冯通令全军上下都要以谷良友为戒，无论亲疏远近，无论老年青年，无论干文干武的，犯了军纪都要严厉处罚，决不宽恕。

“醒炮”和“早点”

冯玉祥很有爱国思想。他在南苑大红门（军官军士教导团所在地）的墙壁上亲笔书有“亡国奴不如丧家犬！”“我们要发奋图强！”等等醒目的标语。

冯规定教导团在每天拂晓前放“醒炮”，周围二三十里的人都可听到。他说：“外国人说咱们是睡狮，狮子睡着了还不如狗呢……”所以早上要放醒炮，把睡着的人都唤醒，这也是富有爱国教育意义的。

教导团三面都有营墙，在营墙外面挖一条深沟，像护城河似的。那里尽是黄土，用挖沟的土筑成台阶，每天早起，队长带着学员在台阶上跑三转，一上一下练膝盖和腿劲，军官教导团有六个队，军士教导团也有六个队，约有一千多人，这么多人在营墙外跑上跑下，形成波涛起伏的“人浪”，煞是壮观。

学员们把这种锻炼叫做“早点”，吃完“早点”，才回去洗脸漱口。一般下雨下雪天也不例外，大雨大雪下令时才停止，这时

学员们就高兴地说：“今天不吃‘早点’啦。”

严格的夜间教育和演习

冯玉祥很注重夜间教育。他常说：“咱们西北军武器是差一些，就要利用夜间的有利条件来反击敌人。”又说：“打起仗来，谁告诉你什么时间？平时都得作战时准备，随时都要提高警惕，一有消息，马上就得拉出去干。”

冯曾派察哈尔都统张之江、绥远都统李鸣钟到南苑，向教导团学员讲夜间教育，不仅教导团教官、学员大集合，凡驻南苑的师、旅官兵，都要集合到教导团来听讲。冯是基督教徒（张之江也是），先得静默三分钟，算是做祷告。夜间教育最要紧的是不许有火光、冒烟，决不准抽烟。无论防御或进攻，都不能有声音。骑兵不许骑着马，只能拉着马走。夜间作防御工事，即使把手打断，也不许叫嚷。一句话，什么声音也不能有。夜间眼睛不成啦，就全凭两耳的听力。

夜间演习，一听到紧急号音，在十分钟内就得整队出发，教官事先也不知道。夜间急行军，纪律要求很严格。还演习辨别方向，纵令是阴天雨天，没有北极星、紫微星可辨，也要利用树、庙等来识别南北东西。要求大步走，步子大身材就矮，以减少目标。有时还要演习夜间行军做饭等等。所以西北军对夜战是有一套办法的，常利用夜间作战出奇制胜。

提倡武术和器械体操

冯玉祥为了增强士兵的体质，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一向对武术、器械体操很重视；他以“四到”来提醒官兵对器械体操的锻炼，四到即想到、去到、看到、做到。不能坐着当官，要身体力行。

曾有一个在参战军第二师师长马良那里当过机枪连长的王永安，同我很熟，他是沧州人，武术特别好，直皖战后参战军垮了，我把王永安介绍到西北军来，张之江看王的武功不错，就留着当副官。有一天，张之江要一个姓洪的武术教官（山东大个）和王永安比赛摔跤，要我当评判。我想要是把姓洪的摔倒，于张之江面上很不好看，他是都统衙门的武术教官，以后就没有威信了。但是把王永安摔倒也不好，他是我介绍去的。我宣布每次20分钟就停，三跤两胜者为胜。第一回合王永安把洪摔倒了，第二跤两人争开了，势均力敌，相摔不下，工夫太久，已过20分钟，我就叫停，就算个平跤吧。因为要两次胜才算赢，现在是一胜一平，借此下台阶。表面上说是平跤，好给洪留点面子，实际他是输了。

冯玉祥对部队的器械体操要求严格。以单杠为例，基本动作就有悬垂、弹道、跨腿上、跨肘等七八项，最高要求是倒立打车轮。时常调集部队官长考验器械体操，并订有奖惩办法，从尉官（排长）到将官（旅、师长）都要参加，如果不及格，排长打军棍100，连长80，营长60，团长40，旅长20，师长罚跪。在单杠旁就放着军棍，谁要不及格，就要当场出丑。有一次考验前，我的一个教导团的学生当连长，他对我说：“老师，我的跨腿上差点劲，我在两条腿上绑上东西，准备挨打。”我立即制止他：“这绝对不成，连穿呢裤绸裤都不成，更甭说绑东西了，发现了非把你腿打断不可。”

官小的考验的项目就多，官越大项目就越少，如连、营长考验4个项目，团长旅长就只有两个。这也是提倡大家都练，挨打的也多是下级军官，借以吓唬士兵，从未听说高级将领挨打受罚的。有些高级将领也确有功夫，如韩复榘、赵登禹都练得特别好，韩是打车轮、拿大顶的好手。

士兵的百字课

冯玉祥对上兵学文化也很注重，他常说：“咱是当伙夫出身的，一个字也不识，等于睁眼瞎，这份罪是够受的啊！”他在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编印有上兵百字课，每人一本，分100字课、200字课和400字课。头年的新兵学100字课，二年兵学200字课，三年兵学400字课。认好了有奖，认不好打手心；有的兵站岗也在学认字，成了西北军的一种风气。冯对士兵们说：“一个好秀才，肚子里不过1000字，你们当了三年的兵，也算是半个秀才了。”又说：“咱们西北军就是个大学堂，教你们认字念书，不仅要学会拿枪杆，还要学会拿笔杆，你们将来能文能武，比起咱当兵的时候可阔多了。”

百字课的内容，除了一般常识和当兵应注意的事项外，还有列强欺负、侵略中国的许多事实；冯也常对上兵讲要奋发图强，以雪国耻，通过百字课来实施爱国主义教育。

冯在部队吃饭的故事

某次，冯玉祥到南苑教导团视察，南苑还驻有第二师等部队，他听到附近连上吹吃饭号，立即前往“吃饭”。连、排长见他去了，喊“立正”敬礼，冯忙制止他们不许动：“弟兄们吃饭吧，咱也和你们一块吃，随随便便，不要拘束。”他也盛碗大米饭，草草吃点就走。

冯又赶到营部，同营长一块吃，同是大米饭，却和连部的不一样。他又到团部、旅部、师部去。大米饭都不一样。

饭后来一次大集合，全体官兵都要到，连教导团也得去。冯玉祥首先问大伙：“你们都吃好啦？”接着说：“人是铁，饭是钢，吃饭是个重要问题……咱们吃的，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种的粮

食，一星半点也不能浪费。”又说：“你们打仗的时候，谁在前头？当一个攻击命令下达，首先是士兵打冲锋，排长在第一线士兵后头，连长又在排长后头，营长、团长更在后头，官越大离枪子越远。咱们打仗是这样摆，说起吃饭来，照打仗的摆法，好点的米应该给前头的人吃。可是现在却是离枪子越远的人，吃的米越好。”他问大伙：“这样合理不合理？”士兵们高声回答：“不合理。”他又问：“官跟兵的肠子肚子是不是都一样？”大伙又说：“都一样。”冯又转问军官们：“咱们说良心话，应不应该这样？”军官们也说不应该。冯说：“咱们当官的对不起弟兄们，我没有下过这样的命令：大官吃好米，小官吃次米，当兵的吃乱七八糟的坏米。”他又问：“是谁发的米？”答是军需处。又转问师、旅长：“你们怎么不下去看看？没有得到命令，你们要自个拿主意呀，以后决不许这样，来了好米坏米，大家得都吃。”士兵们很受感动，对冯推崇备至。

注意卫生 厕所干净

我在军官教导团当官不久，就升了教育长。熊斌说：“你吃饭若下馆子也不行，找个人做饭不好吗？”于是就雇了一个人给我做饭。我先问他抽烟不，他说不会。有一次我由保定家里回来，见到小厨房里在冒烟，拉开门一看，这老头正偷着抽烟呢。我说：“你老快走吧，冯先生知道了那还了得，不把你两腿打烂！”我也没敢汇报。

冯玉祥对卫生也很注意。无论办公处所、军事教育机关和营房，到处都是干干净净，连厕所也不例外，他规定有一套卫生制度，这也可说是西北军的优良传统。我刚当教育长，第一次到军官厕所解大便（以前我因在外面吃饭，住在朋友家里），厕所可谓一尘不染，也无臭味。它是利用倾斜坡度，使粪便立即流出槽

外，掏粪的就在营墙外掏。厕所旮旯里有一堆沙土，有一把木锨，上面写着“粪前一锨土”，我照着做了，解完大便刚回来就有人“报告”，一个管杂务的找我来了，他问：“教育长刚才大便来啦？”我纳闷：当时并没见到有人，他怎么知道呢？我问他什么事，他说：“教育长还有一个工序没有做。”我有点发火：“不是粪前一锨土吗，我已做了，还有什么工序？”他说：“还有粪后一锨土。”我去看，原来木锨的背面确有“粪后一锨土”，这是我粗心大意了。

动员军官眷属剪发

冯玉祥在张家口动员军官眷属剪发，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天，冯打电话给我：“常先生，你来吧。今天我传太太们到督署来开会……”我一到土儿沟，则见下自司务长、排长，上至师、旅长的太太们，凡是在张家口的差不多都到了，莺声燕语，济济一堂。冯说：“今天有一件事同太太们商量商量……”接着就说到剪发（彼时一般太太都留有长发，在头后挽一个髻）的事，意思要我协助。我感到事情很突然，而我对于同太太们打交道很发憊。冯见我发愣，就说：“我来吧。”

76 这使我联想起几天前的一件事，可见冯为剪发早已作了思想动员。那一次，部队在张家口东南沙岭子北面作战术攻防演习，特别用汽车邀请军官太太们前往参观。及演习结束，军官们身上不是泥就是土，有的真像战场上那样狼狈，冯便借此机会对她们说：“打仗就是拚命……你们想不到他们身上那么脏吧，当官的在前线拚命，太太们却在家里涂脂抹粉……这有点不相称吧。”有些太太们很不满意，背地里说闲话：“你只管官，怎么管起我们来呢？”

西北边防督办公署讲堂内坐了不少军官眷属，大约有百多

人。冯说：“头发本来是美观，可是现在咱们中国民穷财尽，百业萧条，天灾人祸相循，国事日非，咱们快要当亡国奴了，不是享太平、讲好看的时候，咱们西北军最穷，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太太们梳个头，本来没有什么，可是第一，每天梳头要消耗许多宝贵的光阴，第二，还要涂脂抹粉、擦油洒香水，很不经济，许多人要买苏州的胭脂杭州的粉，甚至有的还要买外国的化妆品，还要戴首饰，哪一样不花钱？要知道咱们的钱，都是老百姓的血汗换来的，多么不容易，如果太太们都讲朴素，不乱花钱，那当官的就安心啦，甭为家用发愁，那就好办啦。”又说：“有的把头发扎得像云彩一样，花枝招展，这不成了摆的花瓶一样。说得不好听的话，那不成了‘玩意’？”

冯并申明：“我是同太太们商量商量，不是下命令。回去同你们的‘老爷’、‘大老爷’、‘大人’们合计合计，决不勉强（冯平时说司务长、排长是老爷，连长是大老爷，营长、团长以上的大官就是大人）。 ”

当场，冯夫人李德全就站出来说：“就从我开头吧。”她自己又不能剪，冯说我来代劳。立时操起剪刀，把她的长发剪去了。当下就有十来个人表示要剪，她们以为是督办夫人亲自给剪的，也是一种光彩。

俭朴的生活作风

人们都知道冯玉祥是安徽人，其实他的出生和成长都在保定，他家住在保定东城，那是回民聚居的区域。自他当伙夫直到当督办，他的装束仍和在保定当伙夫时一样，平时灰布短打，毛边布鞋，腰间用布带挽个疙瘩，很像保定卖羊肉的回民。他的子女也不许叫少爷小姐，而是叫大小子、大丫头，女的也穿短打。

无论他的办公地方或是家里，设备都非常朴素、简单，都是

粗木家具。吃的也很普通，常说他最爱吃棒子面窝窝头，这是顶好的食品。

张家口还设有一个小型的电影制片厂。为了宣传冯的俭朴生活，曾摄有一部小电影——《冯玉祥的家庭生活》。1925年，段祺瑞派其内弟、陆军总长吴光新到张家口公干。吴认为冯玉祥是伙夫出身，总有点瞧不起；冯则认为吴是段的小舅子，依靠亲戚关系，哪管什么总长不总长，也瞧不起他，在招待方面不免马虎一些。冯或许是故意气他，晚上请吴看电影，却放这一部自摄自演的家庭生活，我们也陪着看。开始时吴勉强忍耐着，当看到银幕上冯玉祥在一个茅草亭里看书，他的大小子和女儿（刘夫人养的）前来请爸爸吃饭……吴光新就起身去了，很不满意地自言自语：“无聊透顶，我看你这一套！”人们说：“吴大爷生气了。”冯知道后说：“让他生气吧……”这次会见没有得到什么结果。

1925年秋，冯玉祥为筹划攻打李景林的军事，由张家口上包头去视察、会商。督署的大员们都到车站送行，铁路局本给他预备有头等车，另外也挂有运兵的铁闷子车。欢送的人到处找不着他，我奔铁闷子车上，他却坐在那里，由副官处预备的新席铺在铁闷子车上。

78 放着头等车不坐，这究竟是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故意“装蒜”，冯却对我们说：“这个车稳当，栽倒了也摔不着。”这却苦了随他同行的高级幕僚们，也只好受点委屈，跟他坐在一起。

冯玉祥的生活虽是那样俭朴，但对高级军官有时也给以特殊照顾。从包头归来，他发给每个将官貉子筒子大皮袄一件，给老太太一件狐皮的，太太则是滩羊皮。他的理由是，老太太养的儿子，对国家有“功”，应穿狐皮；太太还年轻，将来有她的儿子给她。发了不久，又来找我，让人把皮袄都拿出来，他一件一件

翻看，原来衣角写有暗号，看有无掉换舞弊情。

这已是攻打天津的前夕，冯借此激励士气。这次确实收到很好的效果。一举攻下天津，打垮李景林，西北军实力获得空前大发展。冯玉祥拥有 14 个师（步兵 12 个师、骑兵两师）、3 个旅（卫队旅、两个炮兵旅）、5 个团（交通团、教导团）等，成为同奉系、直系鼎足而立的势力了。

（常辑五，李朋整理）

视军队为生命

对军队的平时训练

1914 年，冯在陕西当十六混成旅旅长，全旅才 3000 多人，以后逐步扩编到 5000 人。1918 年至 1919 年，冯驻军湖南常德时扩编到 7000 人。军中的武器都是些老套筒子、汉阳造的七九步枪，还有一小部分大盖板六五步枪。机枪很少，一共只有十几挺。这些武器大部分是打内战得来的。1925 年以后，由苏联运来一批武器，有大陆炮、水压机关枪、水连珠步枪等。

1920 年春，冯驻军湖北礄家矶。作为一个旅，本来只应有两个团，但冯自己扩充到五个团。当时的第一团团长是李鸣钟，二团团长张之江，三团团长张树声，四团团长张维玺，炮兵团团长鹿钟麟；另外还有骑兵营长李长清、工兵营长程希贤、辎重营长闻承烈、模范连连长冯治安、手枪队队长陈玉耀。四个步兵团的营长是：孙良诚，赵席聘，谷良友，宋哲元、葛金章、石友三，过之纲、韩复榘、刘汝明，曹梦九、佟麟阁、刘玉山；炮兵团的营长是孙连仲（另二人不记得了）。实际所领一个旅的军饷，相差一半以上。冯到哪省，哪省的督军都予补给。他的军队人强马壮，令人生畏，所以到哪个省都不愿他常驻下去。

冯军南北奔驰，粮饷确实困难。但冯的军纪严明，他常说：冻死不入民房，饿死不取民食。当时他的军队所到之处，人民呼之为模范旅。

冯的军队行军时，各班抬着帐篷，各连抬着行军锅。旅团营连大都住帐篷，但也有住庙宇的。官兵都自背一身棉大衣，又当棉袄，又当盖被。每人背200粒子弹，一支步枪，一把小铁锹，水壶、饭包、雨伞各一，饭包内装着针线包、步兵教程、军人宝鉴等，大衣内包着鞋、袜、衬衣，这是军人的全部家当。

冯的新兵入伍，先学简明军纪18条：1. 携械潜逃者枪毙；2. 盗卖洋药者枪毙；3. 暗通敌人者枪毙；4. 强奸妇女者枪毙；5. 持械威胁长官者枪毙；6. 私人民宅者严办；7. 拿老百姓一草一木者严办；8. 持械私斗者严办；9. 黑夜惊呼急走乱伍者严办；10. 遇警不报者严办；11. 失火误事者严办……这些条文官兵都得会背、会讲，随时考问。

那年在湖北，全军驻在江岸上，天气非常炎热，帐篷里更热，但没有人敢到荫凉处所或水边上随便乘凉。湖北督军王占元，不准他在湖北久驻，催他开走。1920年冬，冯率军开往鄂豫交界的信阳驻下。当时第三团团团长张树声走了，以第四团团团长张维玺调充，四团缺由参谋长刘郁芬升充。刘骥升任参谋长。第四团驻信阳教场河，冯集合全团官兵，考问简明军纪。二营五连有一个新兵不会背，冯把连长安树德打了3拳，并斥责说：“这个新兵如果犯了军法，送了性命，你应当负责，这就叫‘不教而诛’，你是送命的阎王！”

冯向来不准官兵外出。必须外出时，得向营部请假，发给外出证，按时回营。各营部或团部都设有小铺，卖信纸信封、日记簿、毛巾、肥皂、鞋袜，也有烧饼、油条、花生米等零食。

军队每日两餐，早餐9点，晚餐4点。每餐先站队唱吃饭

歌，歌后每人还要认识两个生字。每早起床后先唱早起歌，然后跑步一点钟，回来后用凉水洗脸、刷牙、打扫清洁、整理内务。7至9时出操，下午1至2点半练器械操、杠子马、跳高、跳远、篮球、足球等等。4点半至6点，练刺枪、打拳，6点半至9点上讲堂，读军人精神书及军人宝鉴、步兵教程等课。班长读军士勤务，官长读带兵规则，伙夫、马夫学习识字，以百字课、千字文等为教材。晚9点熄灯，保证每日睡足8个小时。

每星期有一次阅兵，阅兵后听调，调哪连哪连出来，考刺枪、打拳、劈刀，或制式教练、战斗教练等。全旅官兵看着，当场评论优缺点。每星期有一次行军或夜行军，或急行军，或战备行军。星期日最忙，擦枪、擦子弹、洗衣服、晒铺草、打扫清洁卫生、比赛内务，还得听两点钟的耶稣教传道。

冯常说：带兵要管得严、练得紧。兵如水电，不流则腐，兵如火电，不戢则焚。待兵之道要用霹雳手段菩萨心肠，恩威并用。所以对士兵既要锻炼他成为壮如猛虎，动如脱兔，还要爱护他如手如足，到用时，才能如肢之使臂，臂之使肢。

每逢年节，冯一定有犒赏。每连10元或15元，团长也得赏5元，有时营长、连长也赏3至4元。由班长买些花生、糖果，各班包包子、炖肉。八月中秋节每人4两月饼，中午炖肉，五月端阳节大锅煮菜，吃粽子。遇到假期，请鹤亭讲笑话，说三国，有时亲自扮演文明戏。清明节给亡故官兵扫墓，并发给全军官兵每人信封一个，信纸两页，邮票一张。信纸上印着羊羔跪乳、乌鸦返哺的画，叫每个人写封家信寄回去。

每逢星期日，冯还常常亲自拿了点心、糖果等到医院去慰问住院的官兵，并问他们：你们连长、营长、团长来看你们吗？还嘱咐医官、护士们要看护好病人，给病兵们擦澡、洗脚。

每到月底发饷时，士兵们除买鞋袜、手巾、针线外，余钱一

律存放营部，够10元时，即督促他寄回家去。士兵们向来身上没有成元的钱。

冯常说：官兵食民膏食民脂，我们要保国卫民，替老百姓多办好事。每到农忙时节，用军中骡马，给老百姓耕地，官兵替老百姓修路、修桥、修河，不许同老百姓吵嘴，不许打老百姓。军中的铁工、木工、瓦工，一律用自己的官兵，不许用老百姓，不许拉差。冯常告诉大家：军中什么样的人才都应有，一切要自己来干，做到不扰民，真爱民。在河南信阳过春节时，老百姓家家门口贴红对子，写着冯军万岁等字样。

1921年冯军从河南开到陕西，冯驻咸阳，仍当旅长。1922年冯升任十一师师长，当了16天的师长就成了陕西督军。这时李鸣钟升任二十一旅旅长，张之江升任二十二旅旅长，张维玺调修械所所长，孙良诚、赵席聘、宋哲元升任团长，韩复榘升为骑兵团团长。模范连扩为2个连，改为学兵队，手枪队也扩为两队，改称卫队团，共4个连，石友三任团长。

这时陕西土皇帝各据一方：第七师吴新田据汉中，郭坚据凤翔，胡笠僧据渭北，井岳秀据陕北。陕西地瘠民贫，经济困难，无法大扩充，十一师基本上仍是十六混成旅的人数，全军官兵共9000多人。陕西没有大米，包谷比麦子贱一半，官兵每日一顿白面，一顿包谷面窝窝头。冯也是一样。官兵夜晚只有一件棉大衣当被子盖，冯也是一件棉大衣。副官长建议给他作条棉被，冯不肯。以后旅团长们也建议，他说：我们应当与士兵同甘苦。并说：兵未入室，将不人舍，兵饭未熟，将不言饥，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冬不服裘，夏不挥扇，雨不张盖，皆无盖也。我希望大家都要与士兵共甘苦。大家又说：你是我们的首领，你的身体健康，关系全军，应当保重。最后有人出主意给他加一条军毯，冯说：士兵都无军毯。有人说：现在织呢厂有军毯。冯令加紧赶

制，每班发三条军毯。

冯当督军不驻督军署，住在西北城角空空的皇城里头，他把那里改名为新城，搭上帐篷，手枪队驻在左边，模范连驻在右边，冯居当中。这个旧址一片荒草和乱石砖瓦，很长时间才打扫出来。冯仍嫌不清洁。一天冯把模范连长张自忠、手枪队长陈玉耀叫到操场里，对他们说：操场里砖头瓦块而不知捡，尘土荒草而不知除，足见其术科之不讲也；讲堂里黑板颜色脱落而不刷，桌凳歪斜而不整，足见其学科之废弛也。模范连手枪队是全军模范，如此疏忽，理应处罚，令二人摘下指挥刀跪下。二人对面跪下，并传值日排长带队，即来打扫。从此以后，每日起床先扫操场。

冯时常检查卫生。有时亲到连里检查，有时在阅兵时或下操时检查士兵身体，看看牙刷了吗，耳朵里有灰尘吗，脱下鞋袜看看洗了脚吗，解开扣子看看衬衣清洁吗，有虱子吗，手指甲剪了吗。冯说：千百人住在一起，即容易得病，又容易传染病，要力求清洁。冯还谈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家兄弟三人，都是有名的大夫。老三号称“国手”，他能一服药见效，二服药病愈，三服药除根，大家称他为“国手”。老三说：惭愧，不敢当，实际上我大哥第一，二哥第二，我是第三，怎能算“国手”呢。大家说未听到你大哥二哥的本领如何。老三说：我二哥一年四季会吃预防药，吃了他的预防药，就不得病了，我大哥平时事事讲究卫生，连预防药也用不着，根本就不得病，比起病了还得吃三次苦水强得多了。冯说：从此看来，要想没病，惟一的办法就是平时讲究卫生。

冯向来禁止烟、酒、嫖、赌。每次遇见吃烟的，就给以打的处罚，遇见嫖赌的，打了以后还押起来。冯说：烟、酒可以滋事，酒又能误事，嫖、赌既误事又生事非，军中严禁。

冯看到陕西贫困，无法发展。1922年直奉战争，冯向吴佩孚表示，愿意助吴，吴允许。冯在新城集合官兵讲话说：丢掉陕西督军如同丢掉破鞋。说话时，冯即抬起脚来，把一双破鞋丢得远远的。之后，冯军就向郑州开去。令李鸣钟一旅参加直奉战争，张之江一旅驻防郑州。河南督军赵倜派赵三麻子带了宏卫军三师围攻郑州。冯亲自指挥应战。第三天，胡笠僧带了一旅（徒手的占一半），还有靳云鹗十八混成旅的留守处约500人亦参加作战。只有五天把宏卫军完全打垮了，同时还打垮了老毅军的一个师。

冯接任河南督军，驻开封。六七个月的时间中，成立了六个步兵团，一个学兵团，一个手枪营。六个团的团长是张维玺、石友三、刘汝明、过之纲，葛金章、刘玉山。这六团步兵，1团学兵，都是真正的农民及初高中学生。冯把所得赵倜的枪都发给新兵，巩县兵工厂的子弹也发下来了。三个月的时间，新兵的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都完成了，上战场就能用了。

冯常说：打虎还是亲兄弟，上阵还是父子兵。在他的军队中，如谷良友、谷良民，孙良诚、孙良玉，韩占元、韩德元，田金凯、田金山，潘允荣、潘允玉，都是亲兄弟，事例不可胜举。每次扩编都是派官长回家招家乡人来当兵。如王冠军当副营长时，回到曹州，把曹州天中及南华的学生带走了93个，李鸣钟的侄子李团沙当副营长时回原籍把家乡学生带回30几名，编为学兵连。这些在家乡是同学，在营中还是同学。冯对学兵格外注意，常亲自点名，并将其家乡住址，父母兄弟的名字一一记得。冯常说：军中无阶级，军队是父子兄弟，无论贵贱，一样当军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这一时期，冯一面在督军署办公，一面到演武厅练兵。一天，看学兵团第一连的战斗教练。连长鲁崇义喊了一声：“散开！”前面有水，士兵都奔向前方一个个

都下了水、毫不迟疑：又喊了一声：“卧倒！”士兵们也不管是水是泥，都卧倒下来。冯说：命令一下如山倒，士兵听见命令，赴汤蹈火在所不顾，这是军人的天职。冯时常到新兵团看操和检查生活。

1922年年底，冯任陆军检阅使，军队进驻北京南苑。这时扩编为一师又三个混成旅。冯兼十一师师长。刘郁芬任二十一旅旅长，所属四十一团团团长孙良诚，四十二团团团长赵席聘；二十二旅旅长是鹿钟麟，所属四十三团团团长韩复榘，四十四团团团长过之纲，另外还有炮兵团团长孙连仲，骑兵团团长张树声，工兵营营长赵汝明，辎重营营长闻丞烈；第七旅旅长是张之江，所属第一团团团长葛金章，二团团团长刘玉山，三团团团长×××；第八旅旅长李鸣钟，所属一团团团长石友三，二团团团长张维玺，三团团团长陈玉耀；二十五旅旅长朱哲元，所属一团团团长佟麟阁，二团团团长门致中，三团团团长刘汝明；学兵团团长由冯自兼，副团长高云龙，步兵营营长张自忠，手枪营营长冯治安。除张之江第七旅驻通州外，所有军队都驻南苑。

这一时期，冯对官兵的教育，副营以上军官有高级教育班，连排长有教导团军官队，班长有军训队。三个月毕业，轮流参加学习。请了许多教官，如陆大毕业的郑大章、日本士官毕业的吴锡祺、杨耀东、徐庭瑶、熊斌等。十一师参谋长是石敬亭，检阅使署参谋长是王乃谋，还有不担任参谋长名义、实际办参谋长事情的刘骥、蒋鸿遇。士兵的教育有旅部讲堂、团部讲堂，由旅部参谋、团部团长、副团长、营长、副营长等担任教课。冯从早到晚都在操场，随时抽调营、连、排、班，进行考验。操场里设有树林、高凹地、坟头等地形，还有一列一列的铁杠子、木马、拦阻、天桥、级梯等，当场教验。全军官兵都得学刺枪、打拳及铁杠子。冯在操场里搭了帐篷，常住在那里，亲自教验。参谋长有

公事即拿到操场里请冯批阅。吃饭，即由他的随从提着饭盒、暖水瓶，骑车送到帐篷里。他的号令非常严明。检阅使署发出的号令全军各团营都按号令行事。他还规定：八步以外兵见兵要互相敬礼，官见官也互相敬礼，队伍见队伍，由连长发口令，换正步走向右看或向左看。先敬礼的表示谦恭和气，后敬礼的表示骄傲自满。

冯军各团都设有澡堂、洗衣房、掌鞋房、小铺、菜园、储蓄所等。发饷后一律存款。有的还设有小工厂，做肥皂、毛巾、织布，织毯，制作信纸、信封、饼干、罐头等。

北京有一道河，夏季常发生水患。冯带全军挖河，修路。南苑周围90里修了一道土围子，高1丈，底宽1丈，顶宽5尺，以防水患。军中骡马常借给百姓耕地，士兵们到农忙时也帮助百姓收割麦子，拉车等。

每到秋天，一定要作野外演习，有连对抗，营对抗。每到冬天一定要作急行军、强行军、战备行军、夜行军。一年四季不断有打靶。下雪后打雪仗。每到地冻时挖战沟。这一时期，官兵们都聚精会神，兢兢业业，一个个都是身体健康，精神饱满，士气很壮。

冯每年挑选一次伙夫、马夫、勤务兵来当正式兵。司书、司号也可以改行当兵。冯每月亲自点名。规定逃兵不准过12小时就要报到司令部，不许拉新兵顶空缺。每连每月逃三个兵的，连长记过，逃四个兵的，撤职留任，过五个逃兵的撤职。

冯在南苑还规定了车轮讲话的方式，你旅到我旅，你团到我团，给官兵讲话。为的使全军官兵互相熟悉，作起战来便于指挥，互相支援。南苑的士兵对全军旅团长都有所了解，大家针对他们的特点，在背后编出了一些“外号”。张之江爱引圣经，大家呼之为“张圣经”；宋哲元说话之前先“哦”一声，呼之为

“宋老哦”；鹿钟麟瘦长脸、两撇胡，呼之为“鹿角柴”；刘郁芬说话先“哈哈”一声，呼之“刘哈哈”；孙良诚为天津人，说话常带“嘛”字，呼之为“孙嘛嘛”；赵席聘红脸，上下尖，说话绵绵地，呼之为“赵地瓜”；韩复榘说话结结巴巴，呼之为“韩结巴”；门致中叫“门滴沾”；石友三叫“石大牙”，诸如此类，官兵之间很亲热。

这个时期人数多了，出发时部分驻帐篷，一部分驻庙宇，驻店，很少驻民房。冯一再下令，宿营时指定地点解大小便，不许随处便溺；吃饭时不许借老百姓的碗筷；也不许动老百姓的东西，早晨出发时掘好铺草，扫净院子，行军时决不许拉伕、牵牲口。

冯每次与士兵见面还有一套问答：

冯问：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士兵答：老百姓的军队。

冯问：你们是干什么的？士兵答：保国卫民的。

冯问：你们吃的是什么的？士兵答：老百姓的。

冯问：你们穿的是什么的？士兵答：老百姓的。

冯问：你们的父母兄弟是什么人？士兵答：老百姓。

冯问：你们的亲戚朋友是什么人？士兵答：老百姓……

1925年初，冯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军队又有扩编。这时张之江任察哈尔督统，李鸣钟任绥远督统。鹿钟麟任第一师师长，刘郁芬任第二师师长，宋哲元任第十一师师长，郑金声任第三师师长，唐之道收编为二十师师长，刘彦全任第七旅旅长，石友三任第八旅旅长，张维玺任新编第一旅旅长，蒋鸿遇任第二旅旅长，石敬亭任第三旅旅长，郑大章任骑兵第一旅旅长，王镇怀任骑兵第二旅旅长，席掖民任骑兵第三旅旅长，冯治安任卫队旅旅长，炮兵旅旅长孙连仲，工兵团长赵汝贤。察东镇守使张树声，察西镇守使蒋鸿遇。

察绥两省，民贫地旷。冯想寓兵于农，开垦土地，栽树种粮。当时，冯深深感到，对于垦种事业在军队中他周围的这一些人，很不内行，也很不够用。他说：你是“丘八”我也“丘八”，我们都是军人，对于农业、林业知识很不够，什么事都需要用人。因此，那一时期他从外地约请了一批知名人士，如山东的王鸿一、河北的杨木实，还有更有名的王瑚、李烈钧、黄郛等。这些人也都带了自己的几位随从来到了张家口，协助、策划关于农林种植及开发西北的事业。

那时，蒋鸿遇对冯建议说：自民国以来，中国有20个师20个混战旅，现在消灭殆尽。督军、省长你来我往，如流水一般。惟张作霖、阎锡山有关可守，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以至于今。我们有南口可守，尚有立足之地。但是察绥两省，地瘠民贫，需要进驻陕甘。俗话说，狡兔有三窟，察绥算得一窟，有陕甘才算三窟。欲往陕甘，易如反掌。甘肃督军陆洪涛将衰兵惰，无能老朽。甘肃有四大镇，四小镇。四大镇：宁夏、西宁、平凉、天水，每镇都有一师多人；四小镇：如肃州、河州等，都是一团人自卫，随声附和。宁夏、西宁皆是回族马氏世代镇守使，根深叶茂，人强马壮；平凉镇守使张兆钾、天水镇守使孔繁锦，皆是直系，为吴佩孚所用。我们进入甘肃，他们听则用之，不听则消灭之。然后图陕。北有南口、南有潼关，可以高枕无忧也。蒋鸿遇还说，兵力虽强，不如不战而胜。应该到北京，先请马福祥来，委他为高级顾问，敬为上宾。宁夏镇守使马鸿宾是他的侄子，旅长马鸿逵是他的儿子，西宁马骥、马麟与他也有关系。先借路宁夏，进入甘肃兰州，西宁马骥欢迎，陆洪涛自然不战而走。冯非常赞成，呼蒋鸿遇为“二萧何”，委蒋为西北军参谋长，带刘郁芬第二师入甘。

这个时期，吴佩孚在河南洛阳东山再起，联合张作霖，酝酿

共同打冯玉祥。冯认为初得察绥，甫有立足之地，如若真打起来，将腹背受敌，可能丢掉察绥。冯为缩小目标，减轻敌对，遂将边防督办让给张之江接任。冯到苏联去了。

对军队的夜间训练

冯常说：军人要严肃沉着，闻变不乱，处夜不惊。军队所驻之地，万幕无烛，既不见火亮，又不闻声音；既不许狂呼，又不许急走。

冯带兵时，常亲自领导着，每星期都有一次夜间教育。有时在夜间一两点钟进行紧急集合。官兵全副武装，既不许点灯，又不许说话，比赛谁快，谁整齐，谁肃静，谁人数多，在集合场检查，有预先派的参谋，军法官在各营监督，将其所见情况报告出来，评论某营最好，某营最差。有时是在夜间一两点钟，在最黑的天气，紧急集合后作夜行军。天亮以前走出40里路，回来也是40里，9时到家吃早饭。有时作夜间战斗攻击、防护等动作。有时作识别方向的演习，到大树林里摸树皮，树皮纹流粗厚的面是南，细薄的一面是向北。有时在晴天，官兵坐在地上认指北斗星，有时夜间集合检查后，叫士兵背诵自己枪的号码，刺刀号码，子弹上的号码，决不许错拿别人的东西。有时作夜间挖战壕比赛，某营最肃静，某营最快，既没灯火，又无人伤事故。1921年在北京南苑，一师三旅之众，于冰天冻地之下，在大操场夜间比赛挖战沟，不见一星之火，不闻一人说话之声。

冯还常常夜间亲自出来查夜，穿着士兵的大衣。1922年冯在陕西当督军时，白天对他的炊事员说：明天早晨给我蒸棒子面窝窝头吃。夜晚九、十点钟到了伙房里，又走到炊事员住室查夜。正好炊事员老沈在说闲话：“督军真是贱骨头，放着包子馒头不吃，明天早晨又要吃棒子面窝窝头。”冯在门后听到后，不

动声色地说：“老沈，俺贱骨头当督军，你不贱骨头当伙夫头儿。”老沈发觉冯听见他们的话了，吓得目瞪口呆，一夜没睡好觉。天一亮，他就跑到冯面前，扑通跪下了。冯若无其事地打趣道：“老沈，怎么拿小褂当大褂穿呢？（意指跪下）”。老沈说：“我错了，请督军处罚吧。”冯说：“骂长官是有罪的，你是愿打还是愿受罚？”老沈问：“打是多少，罚是怎么罚法？”冯说：“愿打就是200军棍，受罚吗，200肉包子。”老沈也是保定人，是冯多年的老伙夫头。他接受了受罚。正午12点，包子做好送到大操场。那天冯正集合手枪队模范连比赛，每人赏了一个大包子。

有一天冯住西安新城里，夜晚到了模范连，第一班班长张先洲带着4个兵站岗去了，冯就找了个空位躺了下来。站岗回来的士兵也都睡下了。高清太说，明天不要再翻班长的书了，班长说了，谁再翻他的书就要打人啦。郭道培说，一班就发了4本军人宝鉴，连长要考，考不会也要打人。12个人轮着看班长的书，俗话说，偷书不算贼，偷看书，这算犯法吗？高清太说，你不知道咱们班长外号叫“小长虫”吗，他缠着谁就不轻啊，明天是我值日，最好算你值日好了。郭说我不敢。第二天，冯把连长张自忠叫了去，问他：你连上有个“小长虫”缠着人就不轻吗？张说不知道。冯把昨晚听到的话说了一遍。张自忠回到连里马上集合班长，把张先洲打了一顿军棍。

1922年，冯在河南开封当督军时，夜间查岗到学兵团大门口。按照规定：离站岗的30步以外就高呼站住，问口令，站岗的就作出预备放枪的姿势，答不上口令，谁也不能前走，走就开枪射击，如若忘了口令答不上，惟有站在30步外听候检查。冯进入二道岗时就告诉随从们说：这个口令我答。第二道岗照例高呼：“站着！口令”。冯站在30步外，不敢前进，大声答道是“我”。站岗的一听是督军的声音，马上说：“请进来”。冯走到前

边问他：为什么不问我口令就让进来。岗兵答道，听见是督军的声音，就不再问口令了。冯说好，你还会辨别声音哩。第二天，冯集合学兵团的官长，对他们说：兵要认识官长的声音，官长也要认识士兵的声音；士兵要认识官长走路脚步声，官长也要认识士兵走的声音。连排长是亲兵官，一定要认识这些。不要拿这当作小事情，实际是要紧的事，对于平时战时都有用处。

冯有时到连里查夜，看到大通炕上有空位，就躺到当中睡一夜，早晨吹起床号才走，什么话都可以听到。有一次冯查夜到学兵团第四连薛嘉宾排长住室里，冯用手电筒一照，床下放着一双鞋，床上鼓鼓的被子真像一个人躺着睡觉。冯掀开被一看，见被子下边是一件棉袄衬起来的。冯再看床头上贴的官长回寓轮流表，薛排长是星期五回家，那一天是星期日。冯到第二天集合官长说薛不守纪律，一旦有事，长官都走了，如何了得，重责五棍，以儆效尤。

1927年冯在北京南苑时，晚9点钟吹熄灯号后，士兵多到厕所解手回来睡觉。冯早到了厕所旁边的一个小坑道里，听士兵们讲些什么。当时学兵团营长兼团副张自忠打人最厉害。他打人不用军棍，是用学劈刺的那个劈剑，这个东西中间是竹板，外边用牛皮筋绳子缠起来，打下去就脱一层皮，当中流血周围发青。这一天张自忠打了辘重连长熊胜德。有一个士兵在解手时说：熊连长没有一两个月起不来。营长的劈剑打人多厉害呀，一下去就掉一层皮。另一个说：比扒皮还厉害，连肉也都带下来了。你没看见挨劈剑的人们吗，都是一个血坑子，每天到医院查看。第二天冯在南苑集合全军官长，冯说张自忠不会打人，士兵说他比“活扒皮”还厉害。对士兵要一打二吓唬，让他改了就算了，让他丢丢人就算了。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要恩威并用，不要光指着打。现在你无情地打他，上阵的时候他也会无情地打你。冯随

着定了“八不打”的军规。

练兵的军歌

冯常说：练兵如堆沙，片刻不能松手，一松手就淌下来了。所以练兵要苦口婆心、耳提面命，谆谆告诫。平时详细讲解，临事要在当场，叫士兵记在心里，挂在嘴上，使士兵行走坐卧都要唱出来。这就可以使士兵有所遵循，少出事故。所以每一个行动都有歌，每一个歌都有一定的意义和要求。

新兵一入伍，就先学新兵歌：

有志新兵尔要谨记，当兵须知守本分，保护国家，爱惜百姓。兵与人民一体生，食民膏，食民脂，尔须知民间困苦，重劳俭，重品行，不可忘保护商民。

军中每日两餐，餐前值日排长吹哨子，站队，唱吃饭歌：

盘中粒粒都是辛苦，民脂民膏，来处不易，雨露滋长出此上帝主恩所赐，感谢弥急。

冯从苏联回来后，这一歌的后一句（“雨露滋长……感谢弥急”）改为“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由于军歌的教育，士兵们吃饭时不肯浪费点滴，也不嫌饭菜不好。

练习铁杠子器械操时要唱练习体操歌：

军人第一要习劳，身体必须日日操。吊背、转回、屈身上，锻炼身体最为高。一操百操再再操，操来操去身体好。冯说练铁杠子要长年如一日，把铁杠磨明，拿在手里软乎乎的，叫它怎样就怎样，才算真本事。

士兵练习打靶时要唱打靶歌：

枪在手，目睹敌人刻刻要注意；距离目标更注意，能否实射击？

将举枪，目标未定上、中、下，哪是瞄准点。

既见敌，枪已举起决定跪、卧、站，在重敌中，先决定瞄准哪一个人？

这支歌共有五段。冯说：瞄不准决不放。要发枪，必须一枪打倒一个敌人，才算真有本事。

每日早晨起床要唱起床歌。值日排长吹哨子，点名，唱起床歌：

朝气上升月当空，鸡鸣起舞志长风，枕戈待旦拂晓出，战警醒，努力奋斗，精神踊跃，革命快成功了。

这支歌，冯从苏联回来后也有修改，修改后的歌词是：

黑夜过去天拂晓，朝日上升人起早，革命旗高飞扬，看青天白日满地红照耀，努力奋斗，精神踊跃，革命快成功了。

冯说：每日鸡鸣起舞，戴月披星，才算好男儿。不然的话，懒惰偷安，那是懒种，算不得好男儿。

每日晚间要唱国歌。1920年以前的国歌，说不清了。大约是：

中国雄立于宇宙间，万万年，保卫人民终不偏。

四千余年转治安，保卫人民终不偏，万万年。

1920年后的国歌就是《卿云歌》：

卿云烂兮，乱漫漫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每次轮派营门口站岗时，排长带着要唱站岗歌：

我卫兵，护全军，守职务，振精神。枪支子弹，莫离身，更要时时谨慎十分。全军性命在一身，站岗时要小心。

士兵责任且尊，莫出入，任巡查，细柳营中拦汉文（汉文帝故事）。只知道将军有命重遵，全军保卫在一身，站岗时要小心。

问口令，辨清真，……一夜黑风豪雨有声，这时间最要

仔细听音，莫教敌扑近身，站岗时要小心。

冯说：站岗的责任神圣不可侵犯，要认真执行：歌词要记在心里，挂在嘴上。

在野外实弹射击时，要唱节省子弹歌：

射击瞄准最为先，第一须节省子弹，一粒千金买不来，生死安危在一弹，瞄时不准万不发，发时必中一当千。枪不虚发好男子，千万千万莫等闲。

战时全凭子弹胜，虽有子弹输送难。多少能战之军队，因为乱放大败还。一弹须当性命看，保身保国保万全。枪不虚发好名誉，千万千万莫等闲。

冯说：枪是命，子弹是命根子。一粒子弹千金难买，不准虚发一粒。

到秋天打野外时，要唱利用地形歌：

战斗时重射击，杀敌为第一。选择地形，遮蔽身体最忌是蚁集。留神小排指挥地域不可擅离。攻击之时，切莫占据难起之地，碍邻兵发枪，要注意。

还有射击军纪歌、战斗动作歌，各5段。记不清了，只记得射击军记歌的第一段是：

射击军纪重要，皆当确实之行。虽在敌火之下，务要坚忍沉着，力求发扬枪效力，要振起，歼灭敌人，更要振起，歼灭敌人。

每到行军宿营，要唱爱民歌：

有民而后存国，养兵所以保民。兵民原属一体，理应相爱相亲。秋毫无犯，贤哉岳军，切戒滋扰仗势凌人。

冯说：百姓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不扰民、真爱民，不取百姓一草一木，要学岳武穆的军队、秋毫无犯，鸡犬不惊。

冯常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兵有了性命危险如何痛心！

兵的父母把孩子交给咱，咱们怎么对得起兵的父母？怎么对起自己的良心？怎么能对起自己的职责？

还有国耻歌，在平时唱，在国耻纪念日唱。词句我记不完全，其中有句是：……夺旅顺，夺大连、胶州、广州、海参威，夺我大沽口，割据我台湾。不可忘，誓雪此耻！

劝军人歌，我也记不完全了，其中有：

……步法要精稳，炮兵标尺准为高，骑兵冲敌勇壮，卫兵辎重重要坚牢。步精、马速、炮兵猛，兵力强，国威壮，真荣耀！一劝众军人，学在身，枪法皆练准，军威震外人；二劝急发忠烈心，走凯旋归日，箪食壶浆慰军……。

以上是我所能记起来和记得不完全的一些军歌，其中难免有错误。总之，冯玉祥把军队生活的各方面都尽可能地编成了显近易懂，言简意赅的军歌，让士兵们记在心里，挂在嘴上，对于指导和鼓舞士兵的行动，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王赞亭）

给帽子敬礼

给送礼者二十军棍

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将军从苏联回国后举行举世闻名的“五原誓师”（五原即当时绥远省的五原县，现属内蒙古自治区），接受国民革命。当时军中生活极苦，士兵面有饥色。冯玉祥与士兵同甘共苦，毫无特殊。

那时任五原县长的刘必达，见冯饮食甚差，有意讨好冯，特送来两只鸭子，美其名曰“犒劳”。冯将军见礼非但不收，反而当面斥责道：“你只见我天天吃咸菜，而不知道士兵天天吃不饱饭。礼尚往来，你送我两只鸭子，我回敬你20军棍。”“看谁还

敢来送礼!”

给 帽 子 敬 礼

冯玉祥提倡官兵穿着一致，不搞特殊化。上自总司令，下至伙、马夫，一律布帽、布衣、布鞋、布绑腿。西安练兵时，一天，他在街上看见他的副官吴启明（作者堂兄）戴着一顶官帽子（他是替一位亲友买的），冯抢先向这位副官行立正举手礼，弄得吴启明十分尴尬。冯立即解释说：“你不用害怕，我不是给你敬礼，我是给官帽子敬礼的。”说罢扬长而去。这事一时传为军中美谈，并作为互相规劝的一个戒条。

宋 哲 元 罚 站

冯玉祥率兵从五原解西安之围后，励精图治，准备东征。这时扩军练兵，军纪正严。他规定：不论国民军直属机关或所属连队，一律举行朝会（即每天早晨的集合），主要内容是跑步和作精神讲话，冯本人轮着参加各部队的朝会。一天早晨，他来到宋哲元部队的集合场所，发现宋（当时是旅长）还未到，就直接命令部队集合。他刚开始讲话宋就来了，惶恐地跑步向前敬礼。冯却不加理睬地只管讲他的话，让宋哲元一直站在那里，作为迟到的惩罚。当时的规矩：长官不还礼，部下不敢“稍息”，对将军们也不例外。

几支必唱歌曲

在冯玉祥领导“二次北伐战争”及以后的“反蒋护国运动”期间，部队中有几支很流行的歌曲，起着鼓舞士气、增强斗志的积极作用。例如：

国民革命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锄军阀，锄军阀；
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吃饭歌

这些饮食，人民供给；我们应该，为民努力。
帝国主义，国民之敌；同心协力，灭此朝食。

注：这支歌以伙食团为单位，每餐饭必先集体唱完后，才能就餐。

起床歌

黑夜过去天破晓，朝日上升人起早，革命旗帜飞扬……

注：这支歌是以连队为单位的。每天早晨唱完后才开始盥洗活动。惜乎记忆不全。

背诵《中山语录》

冯玉祥崇拜孙中山先生，在群众集会场合上，他多次提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这些名著。在他代兼河南省主席时期，组织力量编辑一本两万多字的《中山语录》，作为开春各军事学校学员的必读之物，还不断举行背诵会。我参加过一次有各校代表参加的大型背诵会。背诵者要到台上应测，由主测人任选书中一段，先提念头一两句，然后由应测人接着背诵，根据熟练程度分别给奖。真的有人背得滚瓜烂熟（我的成绩差，只得了一套布帙的《中山全书》）。可见其对传播中山思想的重视程度。

官兵一致

冯玉祥为使官兵打成一片，很注意生活上的官兵一致。例如：

1. 官兵一律穿布衣，冬天一套棉军装，一件棉大衣，夏天两套单军服，衬衣是白的。
2. 官兵一律不蓄长发。连队有理发兵，半月剃一次光头。
3. 官兵吃一样的伙食，都拿一块五角的补助。连队有士兵伙食委员会，民主管理，讲究吃饱吃好，月终还要分伙食尾子。
4. 集合、行军时官兵一律打绑腿，系鞋码，扣好风纪扣。
5. 外出官兵相遇，兵先行礼，官长必须还礼。同级相遇，互相敬礼。

重视军事体育

冯玉祥很重视官兵的体格锻炼。连队一般都备有木马、栏阻、跳高、跳远用的沙坑。士兵都要习练拳术、大刀、四路刺枪，特别是器械体操。单杠运动是必修课，即使只驻扎两三天，也要栽单杠。单杠列入晋级制度，是必考项目之一：上等兵升班长要会三套体操，即屈身上、腰荡转回和倒立。班长升排长要会四套体操，即在上述三套基础上再加一套正把车轮。因此，官兵身体一般都很壮实。

《精神书》

《精神书》是冯玉祥专为初级军官和士兵编写的政治课本，装订成64开的袖珍本，人手一册，也是晋级考试的必测项目。该书文字精炼，约5000言，内容有三民主义、爱国主义、军人职责、军人道德等等。《精神书》与《中山语录》堪称姊妹作，是向部队进行精神训练的主要“食粮”。

《不 忘》

1928至1929年，冯玉祥部队在“二次北伐战争”中消灭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等北洋军阀残余后，进行缩编。当时冯兼任河南省主席，拥有陕、甘、宁、豫、鲁横向地盘。他在开封、洛阳分别成立了各级各类军事学校。在开封的有军官学校、军法学校、军械学校、军需学校、测量学校；在洛阳的有参谋学校、高级参谋学校、火车学校、汽车学校、炮兵学校等，主要收容第二集团军编余下来的青年军官及部分青年学生，从事专业培训。为了灌输爱国爱民思想，他特地编拟了几条问答式的口号，名曰《不忘》，发给各军事学校每天朝会时照念。领导人在台上问，部属在下面回答。有时冯玉祥在演武厅（大练兵场）召集各军事学校举行大朝会，亲自领读《不忘》，对学员的精神影响很大。

《不忘》的主要问答是：

问：你们是什么人的军队？

答：老百姓的军队。

问：你们吃的、穿的、住的都是老百姓供给的，你们忘了没有？

答：没有忘。

问：日本人欺负我们连狗都不如，连猪都不如，你们忘了没有？

答：不敢忘。

（吴高明）

恩威并施带兵

冯玉祥的治军，在旧中国新、旧军阀中，有他独特的一套做法。他把自己同官佐士兵的关系看作是父兄子弟的关系，把自己



冯玉祥将军向国民军讲话

这个军事集团看作是一个大家庭，对于自己的部下表现了极大的关心和体贴入微的照顾。

冯玉祥常说：练兵固然不容易，用兵更不容易，而带兵尤难。怎样才能把兵带好呢？最为重要的是能够带住他们的心，只有做到这一点，他们才能够同生死，共患难，否则，不管在训练方面有多么精，在战略战术上是多么讲求，一遇到战争的考验，就会土崩瓦解而不可收拾。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把兵心带住呢？他认为必须恩威并施，才能使官兵畏威怀德。也就是说，一方面要以威服人，另一方面，又要以恩感人。他就是以“家长”的身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的。

怎样才能做到“以威服人”呢？他认为最有效的办法之一是打军棍^①。在1924年以前，在他的军队里打军棍的风气是很盛

^① 军棍长约三尺，径一寸余，手握的一端是圆柱形，漆成黑色；打人的一端为三棱形，下面扁平，漆成红色，中间微曲，这就是当时的制式军棍。

行的。挨打的对象多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旅长以上的军官很少，只记得有宋哲元和张维玺两人。1923年驻南苑时，军官初期定时集合上课，由四个旅长轮值带班。有一次宋哲元值班，迟到了10分钟，立即遭到棍责。那时冯初由协和医院割治疝气回来，躺在床上，他的住室离课堂不远，听说上课的军官均已到齐，而带班的未到，当即叫人看着时钟，宋迟误了10分钟才来，冯命人请军法处邓哲熙来，要打宋的军棍。邓到时见有几位高级军官在那里求情，冯不准，宋自己就爬下来挨了20棍。1925年，张维玺已任旅长，他的部队乘火车北开，经过南口以北的隧道，坐在篷车顶上的士兵被摔死了几名，冯将张维玺棍责20以示惩戒。

冯带兵爱打军棍，只要是没有认真执行他的指示和命令的，就有被打的可能。如在南苑时，举行清洁卫生检查发奖大会，对成绩最好的营，营长及连长都颁发了奖品，每连还发给20块钱吃肉。对成绩最差的营，营长及连长每人打40军棍。执行时，先叫一个姓吴的副官打，打得较轻，冯把他推到一边；第二个叫孙团长打，打得稍稍重点，冯仍不满意；第三个叫郭团附打，打的也很轻，冯立即喝令郭跪下；第四个叫徐团附打，徐团附是日本士官学生，向来没打过人，打的更轻，结果冯喝令徐滚开；第五个叫参谋长石敬亭打，几棍子抡下去，就打得那个连长乱滚乱叫。最后冯说：“军队里必须赏罚严明，才能有进步。我的几个弟弟犯了过错，我要管教管教他们，不料有人想在这里买好。石参谋长才是我的好帮手，做事认真负责。”

冯对军官打军棍，不仅是为整肃军纪，有时也是为了“得兵心”。有一次，冯在南苑操场检阅入营的新兵，询问新兵入营后的生活情况，有一个新兵说：“昨晚还没有领到铺草，在地上睡的。”冯把新兵营营长曲受谦叫到跟前，问他：“昨晚你睡在哪

里？”曲说：“睡在床上。”冯说：“你为什么不睡在地上？招呼新兵，要像侍候你亲爹一样才行！”说罢，把曲受谦打了20军棍。这一方面是为了叫新兵看看，检阅使对待新兵是如何的关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惩一儆百。果然，从这以后，各级官长，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对新兵的照顾真是亲切备至，谁也不敢疏忽慢待了。

在冯看来，打军棍是一种爱护部下的表现，也可以说是一种提拔部下的考验。事实上，有不少人在挨了军棍之后不久，就升了官。记得有一个营长，因为娶小老婆而挨了打，不久就由营长升为团长。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当时冯的部下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打是喜，骂是爱，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是也有例外，军校出身的就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是因为，行伍出身的军官，绝大多数都是由冯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他们一方面对冯有着深厚的感情，另一方面，他们对冯又有着依赖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冯，在别处则找不到出路。军校出身的青年将校就不同了，他们都有一定的军事学术知识，在哪里也能找到工作，合则留，不合则去，挨打是受不了的。冯也了解这种情况，所以他打军棍的对象都是行伍出身的人，军校出身的只是极个别的。记得有一次因发生火警而打了值日参谋张济40军棍。张是保定军校八期毕业的。在他被打之后，和他同期的同学郅超（后改名子举）、胡维屏（后改名伯翰）、刘光甫等几个人都不辞而别，跑到广东黄埔军校当教官去了。后来有的当了军长，有的当了总司令。在抗战时期，胡维屏（当时任重庆防空司令）在重庆见到冯玉祥，冯已经不认识他了。他笑着对冯说：“我就是在南苑你打张济时，同他一起开小差的胡维屏。”说罢彼此哈哈大笑。

冯从多年的带兵经验中，对部下的处罚也是看人行事，有个

分寸的。当军校出身的官佐有了过错的时候，用打骂罚跪等等处罚是很少很少的，尽管他在盛怒之下，也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因此他常常发牢骚地说：“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这些从学校出来学生们，是我们请来的‘军师’，经不起打骂，不得不客气些。”

在清朝末叶的北洋陆军中，打军棍是一种常规的体罚之一。在执行的时候，被打的人还要“叫棍”，就是边挨打边喊：“大人恩典。”辛亥革命以后，在冯的部队里就把“叫棍”取消了。只是在打完之后站起来向冯敬个礼，说声：“谢谢旅长管教。”

这种打军棍的处罚方法，当然不仅是由冯一人使用，他的各级带兵官都是一致援用的，打军棍打得最狠的莫过于张自忠。他所使用的军棍不是上述的制式军棍，而是练习劈刺用的劈剑，这种劈剑是用牛皮筋绳子将竹板缠起来做成的，一劈剑抽打下去就会搥下一层皮。所以张自忠有个绰号叫做“张剥皮”。后来被冯知道了，集合官长讲话说：“打军棍是一打二吓唬，叫挨打的人知过能改就算了。带兵要恩威并用，有如父兄之待子弟，单靠打是不行的。”

冯在打军棍方面，根据经验制定了“八不打”制度，以防止发生事故。“八不打”的内容是：①官长生气时不能打士兵；②士兵劳碌不许打；③新兵不许打；④初犯过错的不许打；⑤患病的不许打；⑥天气严寒、酷热时不许打；⑦哀愁落泪时不许打；⑧饱食和饥饿时不许打（大意如此）。后来又补充了几条，如老的少的不许打，无恩于他的不许打等等。

这种打军棍的处罚制度，一直到1926年冯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才通令予以废除。

其次，还有罚跪。罚跪这一种处罚方法，在西北军的前期，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两三句话不对头，冯就喝令跪下。

冯任陕西督军时，住在西安城东北隅的旧皇城，因为这里早已成一片瓦砾场，就住在帐篷里。冯见操场打扫得不清洁，便把模范连连长张自忠和手枪队队长陈毓耀叫来申斥了一顿，随令二人面对面跪下。他们跪在那里，把值日排长传来带着队伍打扫操场，一直跪到打扫完毕，才叫他们站起。

在南苑时，旅长也有被罚跪的。有一位旅长，他的部队在大操场集合，他自己迟到，看到冯怒容满面，不等冯说话，自己就说：“我来晚了，应该受罚。”说罢竟自跪在地下。部下的官兵看到自己的旅长自动罚跪，也就跟着跪下，一跪跪了一大片。

罚跪这种处罚方法，偶尔为之，倒是能够起一些作用的。可是被罚跪的人次多起来，反而作用不大，有的人甚至对罚跪抱着满不在乎的态度。如有一次冯的副官长朱连璧在罚跪的时候，趁冯不在，喊传令员给他沏壶茶喝。传令员把茶壶茶盅放在他的面前，他就悠闲自在地品起茶来。冯转来看见他正在跪着喝茶，也有些忍不住要笑，便说：“罚跪还能喝茶？”这位副官长说：“谁家的法律也没有罚跪不准喝茶的条文啊！”一句话把冯逗乐了，连说：“有你的，去吧！去吧！”朱和冯同时在一起当兵，是多年的老朋友，所以他敢和冯开玩笑。

冯这一套处罚的方法，当然是封建落后的方法。但是，在他的军队中因被处罚而开小差的比其他军队是少的。这是因为他的“以威服人”，只是带兵方法的一个方面，还有“以恩感人”的另一方面，两者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也就使得人们安之若泰了。

冯经常以带兵要得兵心教导各级军官。冯在这方面，可以说下了最大的功夫。所以他的军队与其他军队相比较，无论在军风纪方面，还是战斗力方面，确实有他独到之处，这同他的“得兵心”的带兵方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怎样才能做到得兵心呢？他的做法是先从“勤求兵隐”入

手。他经常亲自到兵棚子里与士兵同吃同住，同他们谈生活，谈家常，谈志愿，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对他们的连排长有什么意见，都一一记在日记本上。有时在无意中听到他们一些私下的议论，他也默记下来。还经常派自己的亲信随从深入到下层了解情况，部队里的中下级军官也经常把一些情况直接报告给冯，冯便根据这些情况，把存在的问题及时地加以解决。有些问题总喜欢由他亲自去处理，例如：升了级的官长，都要亲自向冯谢委，冯即当面勉励一番。甚至一个班长升了排长，也要亲自向冯谢委（北京政变以后，部队扩大，驻地分散，这种情况就很少了）。当班长升排长向冯谢委时，冯常常亲自把一套新军装、一柄新指挥刀和一顶新金箍军帽给这位新排长穿戴披挂起来。

冯常常亲自到连里检查卫生看看士兵的牙齿是否干净，指甲剪了没有，眼睛是否有痧眼，解开钮扣检查内衣是否清洁，脱掉鞋检查洗了脚没有，到伙房里看看伙食，到营房里看看内务，问他们吃的怎样，睡的怎样。总之，是体贴入微，关心备至。

冯还经常亲自到医院里慰问伤病号，亲自为他们擦澡，有些伤病号为此感动得流泪。在战时，有的伤兵还未痊愈，就要求出院回到前线。有时遇到为伤兵输血的时候，他听说伤兵的血型同自己的血型相同，他马上把袖子挽起来抽自己的血液，用来挽救这个伤兵的生命。由于冯的以身倡导，他的部下也都效法他的做法，所以他的军医院所需的血，是不需要从外边去买的。他有时还亲自为部下担任看护。如程希贤扔手榴弹炸掉了右手，在治疗时，冯亲往探视，并送些鲜花和食品。有一次李鸣钟受了冯的申斥，他在家装病不上操，冯知道他好使小性子，便亲去看他。李以被蒙头，呻吟不止，冯虽然料到他未必是真病，但他认真地抚摸他的头，看看他的脸色，问长问短，安慰他好好调治，安心静养。经冯这么一慰问，他的“病”也就霍然痊愈了。冯常说：

“带兵要如父兄对待子弟一样，要亲之近之，才能建立深厚的感情。”

他的部下绝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出身，因此经常告诫他的部下不要乱花钱，特别是严禁烟酒嫖赌，要把薪饷节存下来养家，有余力的要置些田产。在军队中设有储蓄所，每月发饷之后，除了留一些必需的费用外，把钱储蓄起来，俟积有成数时，就代为寄回他们家中。

冯的元配刘夫人，常常瞒着冯向军需处要钱，冯得知这种情况，常常引起口角，甚至动手打过几次，夫妻之间因此失和。但是这位刘夫人仍然多方借口要钱，军需处又不敢不给。日积月累，她竟在北京城内外买了新房子20多所。刘夫人故去后，冯检查她的箱子，发现了这些房契，冯除了留下两所外，其余都分赠给他的军官。冯在南苑时，曾以很低的官价买了许多官地，也分赠给部下。有一次团长以上军官还分赠价值数百元的新旧书籍。冯任西北边防督办驻张家口时，曾一次买了春绸数百匹，羊皮袄数百件，分赠给团长以上军官的父母。1928年北伐时，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每人赠给两箱高级日用品。

此外，为了部下子女的教育问题，曾经在十六混成旅时期办了几个官佐子弟学校（先称育德学校，后改称今是学校）。为了提高官佐家属的文化，还办过一个培德学校（后称求知学校）。

他的部下，家中不断有人来探望，冯必派专人招待他们，请他们吃饭，赠送他们一些应用的物品。他们看到自己子弟在部队过得很好，又长了出息，无不满意而去。

冯的司令部设有专管抚恤的单位，对阵亡或伤残官兵的抚恤金办得很认真，不管军饷多么困难，抚恤金是一文也不许拖欠的。如北伐时期，第二集团军总部内，于军政司下设有抚恤处，以武景唐为处长，傅德贵为副处长，专办抚恤，一次拨付专款

20 万元，自订抚恤条例，阵亡的将官一次恤金为 6000 元，校官由 2000 元到 4500 元，尉官由 1200 元到 2200 元，士兵由 300 元到 900 元。在政府未发抚恤金以前，先由本军垫付。发放办法，是先发半数，其余分年领发，这是其他军队所没有的。

冯在驻防地区置有公墓和烈士祠，每年清明节，冯必亲率官兵到公墓和烈士祠祭扫。

对阵亡军官查无子女时，曾为之立嗣，如连长李振芳阵亡无后，冯在北京孤儿院抱来一个五岁的孤儿，起名李正义，作为李振芳的儿子，先送香山慈幼院抚育成人，后又送育德中学，在中央陆军交通学校毕业后，随冯工作很久。听说曹鸿勋也是为一个阵亡的曹营附立的后代。

除了上述的一些事实之外，冯还亲自介绍官长之间结成亲戚，提倡官长之间拜把结盟。尤其是他的招兵方法与众不同，他从来不采用设立招募处的办法，而是派军官回家乡去招募。这些招来的新兵，非亲即故，而且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营混子”和“兵油子”是绝对不能入选的。

上面所述事实，仅仅是就笔者所能记忆的述其梗概，当然不够全面，不够具体。但是对于冯的带兵术，已可窥其大略。

冯常常说：“带兵之道，如鸡孵卵，如炉炼丹。”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带兵练兵方面给人们的印象之一，是他以此为最大的乐事。不论他遭到什么困难问题，使他感到无法解脱的苦闷，当他看到自己的士兵的时候，立刻使他变得活跃起来。他能够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在操场里活动，经常给军队一气讲三四小时的话不觉劳累，而且越讲越有劲。他那通俗易懂、穿插着有趣故事的讲话，紧紧地抓住了士兵的心。士兵在听讲的时候，都是全神贯注，毫无倦容。冯嗓音又极为洪亮，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扩音机，而在上万人的大操场上，能够使每个人都听得到，听得清。

他为什么在带兵练兵方面付出这么大的精力呢？一句话可以解答这个问题，他的军队就是他的生命。

正是由于他在“恩威并施”方面做得很认真，很有效，所以在绝大多数官兵的心目中，认为冯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时又感到他是一位使人爱戴的尊长。周恩来总理曾说：“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

（王式九 吴锡祺）

爱兵如子

四根杆子

四根杆子是个地名，是南京的一条小街。但是，我们提到的四根杆子，指的是那条街上的一座小楼。

1928年北伐胜利以后，冯玉祥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调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仍在开封，由参谋长秦德纯负责留守。冯想到我们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200多位同学，从张家口转移宁夏，五原誓师以后又随先生转战陕西、河南，未能完成学业，就叫我们都到总司令部报到，送我们到北京陆军大学深造。到得早的，赶上陆大考期，到北京去了。宋聿修就是其中之一。到得晚的，错过陆大考期，就到南京集中，我是其中之一。到南京以后，我们就住在四根杆子。

四根杆子住的是豫、陕、甘赈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刘治周。我们在那里住席棚，打地铺。冯看见了，就对刘治周说：你们没有几个人，另外找地方。这里给他们住好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四根杆子住下。每天由外交部秘书唐玉如等来给我们教英文，准备到英国去留学。这时我们没有工作，只是学习，生活又

好，真是悠闲自得。可就是不能乱跑。因为冯不定什么时候来，也许一大早，也许是半夜。

有一天，忽然听到一个坏消息，说是有几个同学从北京考陆大回来，一到南京就被军政部关起来，还一天不给吃饭。我们急了，就去问副官长许祥云。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事情是这样：冯有个规定，在他的部队担任警卫的京汉铁路北段，客车后边挂有军人专用车厢，不准军人和老百姓坐一起。这几位在北京考陆大落选的同学坐在民用客车上，被执法队发现了。执法队批评他们，他们不买账，因而引起争执，几乎打起架来。执法队向执法处控告了他们。执法处处长徐伟烈是一个执法严峻的人，他立即报告了秦德纯。秦德纯不便作主，就报告冯。所以这几个人一到南京，就被关了起来。

我们听说情况以后，就托许祥云去说情。许祥云带我们去见曹浩森。曹浩森原是第二集团军的参谋长，当时是军政部次长。他也不了解原因，就去向冯请示。两天没有回信，第三天夜里，开来一辆大卡车，把我们全部接到军政部去。冯对我们说：“科举时代，举子入考场只带两件东西：一块干饼一条绳。饿了吃口干饼喝口水。出来以后，中了不说，如果不中，一条绳子上吊自杀，哪还有脸见人。你们可好，落了榜还找人发火，不压压你们的气焰行吗？”说完就叫我们回去，并叫那些同学也跟我们一起住到四根杆子。因为他们来晚了，跟我们一起学英文赶不上进度，就改学德文、法文。后来，我们去英国，他们就去德国、法国。如张文勇上德国去了，陈先政上法国去了。

为了送我们出国留学，冯不但叫外交部长王正廷为我们找教师学外文，还在励志社和我们一起吃西餐，教我们吃西餐的规矩。如餐具怎样摆，宾主怎样坐等等。冯还特别嘱咐我们说：“吃西餐有定量，不像我们在家吃馒头，一顿好几个。面包一次

两三片，多了人家会笑话的。”所以我们到英国后吃饭不敢多吃。总是吃不饱，只好饭后自己买点心吃。

从严治军一例

传令队是最接近冯的人，而冯对他们的要求也最严。冯对他们说：“我对人有三种态度，对路人，我只说他好，不说他坏；对友人，有了缺点，就对他进行劝告；对自己人，有了缺点，犯了错误，就要严加管教。为什么别人的孩子有了错你不管，自己的孩子有了错就要训斥，甚至打骂呢？就是这个道理。”

第八师师长韩占元（后改名瞻园）勇敢善战，打起仗来总在第一线，从来不打败仗。但是骄横抗上，谁也指挥不动，只听冯调遣。有一次不知犯了什么错，从师长降到上尉副官，还得和传令队住在一起接受看管。可是，改正错误以后，立即出任军长，参加战争。我想，这样从严治军、赏罚分明的精神，其他将帅有吗？

泰山修路

冯夫人有个弟弟叫李连海，也常常随侍先生左右。因为他总是嘻嘻哈哈，冯说他“二马蛋子”。他和我很要好，谈起话来总是“哥们哥们”的。有一次他要下山洗澡，约我同去。他骑冯才买来的三枪牌自行车，我骑自己的普通自行车。我说不行，他却一定要拉我去。我只好跟他去了。下山时，他骑得飞快，我也得飞快地跟着。

从我们驻地普照寺到三笑处，路稍平些，还比较好走。一过三笑处就不行了。高高低低曲曲弯弯，石头又多。碰上大石头，就得绕道而行。他在前边飞，我在后边赶。碰上一块大石头要拐弯的时候，我的车子一歪，撞在了石头上，小腿碰伤了，鲜血直流。我赶快撕下一块衬衣把伤口包起来。他们把我送回家，并在

冯面前给我请了假。因为不让冯知道是不行的，他随时有事就会找我。

过两天我回到山上，冯问我好了没有，我说好多了。冯说：“这都是因为没有一条好路，咱们修路吧。这是一件利己利人利大众的事，凡是利己利人利大众的事，我们都要干。”

按照冯的计划，路修两条。一条从小五庄起，经范先生的“山庄”（几间草房，人们叫它“山庄”）到泰安车站。这一条路要三公尺宽，可以走下一辆人力车。另一条从三笑处到泰安北关马路。这是一条小路，一公尺宽就行了。劳动力主要是手枪营，另外雇一个石匠。一个石匠忙不过来，冯就叫魏凤楼（当时的手枪营营长）挑两个士兵学石匠。后来这两个士兵就真正成了我们那里的石匠。

几个月以后，路修好了。冯对我说：“你看，如果早把路修好，你也不会碰伤了。”又对魏凤楼说：“你们练兵也有操场了。每天早上跑跑步，跑多了，路也踩实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还是先生想得周到。”泰山的老百姓反映就更多了，不论是割山草的、抬山轿的、担担子上山下山的，没有不说冯好的。修路起了许多石头，又开出了许多耕地，农民也高兴得到处传颂。

去北上高

111

北上高在我们驻地的东边，离五贤祠有近十公里的路程。那里是泰山武训小学最东边的一个分校，有六间房子，分两个班，学生也比较多，因山路崎岖难走，人们很少到那里去。有一天，冯要去看，大家说抬山轿不好走，不必去了。冯说：“抬轿难走，我就步行去。”我不放心，就和传令队队长刘纯德研究，不叫冯知道，叫张三跟去（张三是冯最信任的一个抬山轿的）。抬轿钱我们暗中给他。

去之前，冯叫传令队的庞绍绪买了十斤熟牛肉、十斤煎饼和一些咸菜。又把牛肉分成30包，每包里面加一片咸菜。他叫买这些东西是给谁吃的，我们也不便过问。因为我们知道，冯做事大小都有他的用意，我们是想不到的。

走了一段路，冯叫我们去请范明枢先生。范住在元宝街。我和一个传事兵一块去，一会就到了。范问冯中午饭怎么吃，我们说带的有煎饼。范说：“那好，我也吃煎饼。”因为煎饼是放几天不会坏的，所以家家都有。他拿了些煎饼带着，又叫我们先走，去照顾冯，自己就坐着冯特别为他置备的前边拉后边推的人力车也跟了上来。

我们一到北上高，那里的老师学生都列队欢迎。冯问是谁走漏了风声。范笑了笑，原来他比我们路熟，早已先我们而到了。

冯一到北上高，就和那里的师生谈论学校的情况，接着又找高老太太谈话。这高老太太家是北上高人口最多的一家，她在大门口给我们搬两张床，我们就坐在那里休息。冯和她谈了很多话，她很受感动，说：“我们祖祖辈辈也没有一个人上过学。你老先生（泰山居民都称冯为“老先生”）真好。你来了，我们的孩子就有学上了。”又说了许多冯办的好事。该吃午饭了，高老太太请我们到她家吃饭，我们说，我们带有煎饼，她就回去了。

北上高有些近村来的穷学生吃不起饭，学校每月发给两元煎饼费，中午吃煎饼，学校供给开水，就不回去了。我们也要了一点开水，大家开水泡煎饼就着牛肉、咸菜吃起来。冯也是大口大口地吃。农村用的白瓷碗，他吃两大碗。我想：“有些人说先生的朴素生活是假装的，那么请他们吃吃这煎饼试试看。”

30包牛肉，我们一人一包是吃不完的。剩下20来份给谁吃呢？原来，这里离家远、中午不回去的学生还有20来个，冯就叫我们把剩余的牛肉、咸菜、煎饼分给他们吃。孩子们难得吃到

这样好的牛肉，都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了。这时我们才明白冯这样安排的用意。

回去时，张三抬山轿给冯坐。冯不坐，并问是谁叫张三来的。我们说是张三自己来的，并说：“人家老远跟来了，不要辜负人家一片诚心。”冯这才坐上回去。

请大家吃西瓜

德州西瓜大而甜，吃了叫人口爽心清。1935年夏天，韩复榘派人给冯送一些德州西瓜到泰山五贤祠。冯喊三个站岗的卫兵也来吃，并问他们好吃不好吃。大家齐声叫好，并说从来也没有吃过这样好的西瓜。冯说：“叫你们营副来（那时魏凤楼是手枪营营长，我是营副），叫他到德州买西瓜，多买一些，大家都尝尝。”我问冯买多少，冯说：“买一车厢。”又叫我到济南去找闻承烈（济南市长）。我到济南给闻承烈一说，闻说：“这不难。德州还驻我们一个团，团长是高兰田，你去找他好了。”我到德州找到了高团长。他很高兴地带我到车站去看那些集中起来的西瓜。大堆的西瓜按成熟程度分成几等。有的是现下就吃的；有的是可以放几天的。能放三天或五天都有区别。由于瓜的个头大小都差不多，所以买时，论个不论斤。高团长替我们要了一个载重25吨的木闷子车皮。一车皮可以装1000个，我们买了五六百斤。

西瓜买回来以后，冯叫运到烈士祠，请泰山武训小学的全体师生和手枪营的全体官兵都来吃。学生是三个人一个，士兵是五个人一个。热心办学的张三和附近村庄的老人们也都各有一份。还给关帝庙住的干部们送去了。冯和夫人以及他们的几个孩子也都来了，范明枢、张雪门等几位老先生也来了。一时间烈士祠热闹喧天，人人兴高采烈，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冯先生处处都想到我们。”

张佩荣卖地

张佩荣，泰安县人。冯玉祥当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他是十四混成旅旅长。张宗昌当山东督军时，他当过曹州镇守使，又调兖州镇守使。他当曹州镇守使时，我正在六中（曹州中学）念书，人们都称他为张军门。军门衙门常常唱堂戏。由于一位老师的引进，我也常去看戏。我看见张佩荣坐在大厅里，一面看戏，一面品茶；有人打扇，有人递毛巾，派头大极了。出来进去还穿长袍马褂，坐八人抬的绿帷大轿，俨然一个大官僚。

张佩荣的财产很多。济南有他的房子，泰安西关也有他的两处大宅院。土地就不知有多少了。这时他在泰安住闲。有一次他到五贤祠去见冯，冯午睡未醒，他就在普照寺我们手枪营营部里坐等。闲谈起来，他听说我是六中学生，就说六中办得怎样好，培养出多少人材，又说他多次去过六中等等。我们谈到冯办学的事，谈到泰山我们小学买地的事，这就引起了他的注意。

原来冯给武训小学买地，都是寻地给的好地价钱，所以老百姓一听说学校买地，都争着给。张佩荣听到这情况，就非常热情而又急切地对我说：“扇子崖下边有我一块地，地块又大又平，离小王庄又近（小王庄办有武训小学的分校），卖给学校吧！”我说：“回头给先生说说吧！”

张佩荣见冯时谈了许多话，可是没敢提卖地的事。他走后，我把他的意思给冯说了。冯说：“这个老财迷，又想发财。送给咱可以一文钱也不记。你去给他说，他要是肯捐赠，我们给他抬匾挂锦旗，也算他给泰山老百姓做点好事。”

后来我到济南去见张佩荣，他见到我，招待非常热情。我对他转达了冯的意思，他说：“再研究，再研究。”这件事就算搁住了。

泰安中学校长

泰安中学校长高寅（字其宾）不知为什么被学生轰了出来，跑到县政府。冯知道了就说：“老师是学生最尊敬的人，学生不尊敬，想必不是好老师。你看范明枢先生，他对学生好，学生就尊敬他。”

谈到高寅是六中（曹州中学）毕业、北师大毕业；他的后任李映元也是六中毕业、北大毕业，冯就说：“人家都说何思源（教育厅长）用人有个条件，即六中、北大、哥伦比亚，看来一点不错。”我说：“一个北师大毕业，一个北大毕业，当个中学校长还不够格吗？”冯说：“那么多的北大、北师大毕业生当不上中学校长，为什么偏偏他们能当上呢？”我想了想，冯的话还是有道理的。

其实这根子还在王宏一。王宏一曾任山东提学使、山东省参议会议长，是六中的老校长。他办学是十分严格的，常说：“就是省立，也跟私立一样，校长就当一切家。”学生上课，迟到两次就得受处分。所以六中在山东最有名，出的人才也最多。王宏一在北京办一个南华学院，专门为六中毕业生报考大学准备生活条件。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了山东教育界的一个派系。

115

“委员长”和“蒋先生”

1936年，冯玉祥任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以后，经常到南京汤山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讲话。在讲话中，每次提到“委员长”时，三个字一出口，“刷”地一声全体学员马上立正，就是陪坐的军官们也站得笔挺。即便在课堂上，也要立即放下书本、文具，挺直地坐着，两眼注视前方，像木雕泥塑一样。

冯对这种情况最看不惯。在归途的汽车上，他对我们说：

“人家喊我老冯，我觉得十分亲切。咱们在泰山提到蒋介石时，不也是老蒋长老蒋短的，多么爽快。在这里竟有这么罗嗦！”从那以后，他给学员讲话，提到蒋介石，再也不说“委员长”了。只说“蒋先生”如何如何，避免许多麻烦。

第一密友李烈钧

抗日战争开始时，刘汝明送给冯玉祥两匹好马。冯说：“我们是得练习练习骑马，将来打日寇，少不得要在山里和他周旋，光靠坐汽车指挥战斗是不行的。”他叫人在陵园他的公馆的东侧搭了三间芦席棚，专门派两个人在那里喂马，又叫西华门办事处的杨国体来练马。杨国体跟冯多年，当过骑兵团长，练马是很内行的。冯常常来这里试骑。李烈钧住得离我们近，冯也请他试骑。李烈钧年纪大了，没有骑，但他却多次陪冯到马棚去，边走边谈。

南京黄埔路有个励志社，是国民党军政官员的俱乐部，各项文体活动的设备都有。有一天，国府主席林森约冯到励志社打台球，冯不去。林森打电话给冯说：“协和（李烈钧）、文白（张治中）都在这里，你总可以来了吧？”冯才去了。

这些事都使我联想到冯和协和先生的亲密友谊。回忆过去在张家口时，李烈钧一去，冯就叫他住在图书馆他自己住的那座房子里，而那里从来是不给别人住的。在泰山时，李一去，冯就叫他住在风景最幽雅的王母池，并派一连卫队保护他。李的长公子贛朋因作风问题父子不和；贛朋跑到泰山，经冯教育，恢复了父子关系。蒋介石请冯到南京去，冯不去；李到泰山斡旋，冯还是去了。冯在南京陵园住，经常和李同车出入，一路上无话不谈。那时汽油短缺，冯一听说李没汽油了，就立即派人送去。在庐山时，冯每事都找李商量，甚至上山下山也要征求李的意见，他们

为什么这样亲密呢？到现在我还是不明白。

(孙冠贤)

奋斗的一生

御 香——玉 祥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冯玉祥先生12岁。那时候，他的父亲在李鸿章的淮军里当连长，驻防保定，月薪纹银30两，五口之家，本来是可以得到温饱的，但他父亲有鸦片烟瘾，因而家庭生活相当困难。当时营中军官多把子弟补入军籍，以便多拿一份军饷，作为家庭生活补助。一天，营中出一兵缺，掌管军籍的营部书记长向营长（那时叫做管带）请示由何人填补，营长张某正在烟榻上喷云吐雾，吸完一口烟之后说：“冯老爷（指冯玉祥的父亲——那时军中营级以上军官称‘大人’，连级以下军官称‘老爷’）对我说过多次了，这次别人都不能补，就补冯老爷的孩子吧。”那位书记长问，冯连长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张营长命书记长去问冯连长，冯连长回寓所了，不在营内，而那位书记长又急着向上呈报公文，张营长说，随便给他起个名字好



冯玉祥将军

了。于是，张肯长面对烟灯思索了一阵然后说，就叫个冯御香吧。含义是在朝廷跟前能以吃香的、喝辣的。其实，冯玉祥先生本名基善（他的哥哥名基道），但军籍册子已经上报，不能更改，只好将错就错地沿用下去。迨至辛亥革命，民国改元，始取御香的同音字而改名玉祥。

“官 迷”

冯玉祥虽在 1893 年名列淮军军籍，但因年龄太小，并未入伍服役，只是每月点名关饷时，去到连队应点而已。由于冯体质强健，发育较早，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14 岁时，身材高大，已和成年人一样，于是他正式下连服役了。他一下连，每天早晨跑到操场里，练习喊操。由于他的嗓门高，声音宏亮，他常充当营长、团长的“叫班”，即代替营长、团长喊操的喊操员。除练喊操以外，他一有空就练瞄准，先是两手举枪，后用单手举枪，最后枪上还要挂上一支枪，正因如此苦练，他的射击技术达到百发百中，有神枪手之称。冯在入伍前，只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入伍后，他急于学文化，恰好他的同班（那时叫做棚）弟兄尤鹤亭（河北保定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爱看《三国演义》、《列国志》、《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每天操课之暇，冯就请尤鹤亭教他读书认字。尤鹤亭亦很乐意，对冯帮助不小。由于冯的勤学苦练，别人就讽刺他，说他是“官迷”。特别是他们的班长（那时叫做正目，俗称棚头或老总）邢得胜，以蔑视的眼光对冯讥笑说：“我当了八年的老总，还没当上官，像你这样肉头肉脑，你要当上了官，我就下外国去。”冯当兵时，憨厚老实，不多说话，逆来顺受，不与人争，因此，同班弟兄多以为他可欺。例如吃面条的时候，别人抢先把稠的捞完，等到冯去捞时，光剩稀汤了。但是，冯在同班里有三个把兄弟：一个就是尤鹤亭；一个是

谷良友，山东巨野人；另一个忘其名，会打拳。这三个人都是爱打抱不平的人，遇有谁来欺负冯，他们就会拔刀相助，尤其是谷良友，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别人都不敢惹他，因而也就不敢再惹冯了。谷良友处处护卫冯，照顾冯，例如以后凡是吃面条的时候，他总是抢先给冯捞一碗稠的，然后才能轮到别人捞。

刻苦自学

19世纪90年代的淮军，已经非常腐朽，装备十分落后，武器还是刀矛弓箭，薪饷微薄，军纪松弛。而当时袁世凯练出的新建陆军，则是洋枪洋炮，德式装配，薪饷高出淮军一倍，营规森严，朝气蓬勃，人强马壮，焕然一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冯玉祥脱离淮军，改投驻北京南苑的新建陆军北洋第六镇，从此他精神振奋，更加积极地学操法，练武艺，异常努力地刻苦自学，尤其是醉心于学习文化。

那时候营门口有一个摆纸烟摊的，名叫邓长耀，字鉴三，冯打听出他是一个落魄的秀才，于是就请他每天在三操两讲堂的业余时间授课两小时，冯于每月六两银子的饷款中拿出二两来，给邓长耀作为束修。“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冯每天晚上就寝前，在兵舍里复习当天邓先生授给他的课程。同班弟兄中有一个名叫李建堂的，为人调皮捣蛋，专门与冯为难作对。冯在高声朗诵时，李建堂就在他的身旁弹三弦、哼曲子；冯念书念不下去了，就趴在桌子上习字，而李建堂这时就趴在冯的对面摇晃桌子。冯实在忍不住了，就质问李建堂：“我念书，你弹唱词曲，我写字，你摇晃桌子，这是何苦呢？”李建堂强词夺理地说：“你念你的书，我弹唱我的词曲，这是各人的自由；桌子是公家的，许你写字，就不许我晃荡？”冯见他不可理喻，只好在吹罢熄灯号、大家就寝之后，自己再点起灯来默默复习。可是，这时候李建堂又说话了，

说什么灯和油是大家伙食中开支的，不是你冯某的私产，你不能单独动用啊！冯无词以对，只好熄灯就寝。翌日，冯自己出钱买了洋灯洋油，等到晚上大家就寝后，他就点起灯来复习功课。此时李建堂又开腔了，他说：“班长，明天我要请病假，因为有灯亮睡不着觉，下操、上讲堂的时候没精神、打瞌睡，我就要挨揍啦。”他说得头头是道，班长没有理由驳斥，只得命冯熄灯睡觉。由于冯的身材高大，站队总是站排头，他的铺位紧靠墙壁，第三天，冯在墙壁上挖了一个刚刚放下一盏煤油灯的壁龛，等到晚上大家就寝后，点起那盏小灯，他把脸面紧贴着壁龛，同时用书本堵着灯光不向外射，默默地复习功课。这和匡衡的凿壁偷光，足可相仿。就是这样，他每天白昼受课两小时，夜间复习两小时，不到两年时间，他读完了一部《纲鉴易知录》。这样，连《三国演义》、《列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和一些军事书籍，他都能看得懂了。尽管李建堂这样的人对他百般刁难、干扰、阻挠，但冯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实现了刻苦自学的愿望。

老 实 人

冯玉祥当兵的时候，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实人。但是，老实人有时候也会做出不老实的事情。有一天，队伍打野外收操回营，路过营市街的时候，街旁有一个倚门卖笑的女人，冯用左手向那女人指了一下。与冯同列的有四个人，都没看清指了那个女人的究竟是谁。回到营内，连长命令与冯同列的四个人一齐出列，问是谁指了那个女人？冯立即供认不讳，而连长认为冯是个老实人，不信是他所为，反而严讯与冯同列的那三个人，当然那三个人都不会承认。于是，连长喝令那三个人跪下，冯马上也陪着跪了下去。事后冯向那三个同列的人再三陪不是、道歉了事。

挑“小队子”

袁世凯的卫队，叫做“小队子”。袁世凯喜欢身材魁梧的大个子，他的卫士身高差不多都在一米八以上。这些大个子都是从各部队里挑选出来的。冯玉祥身高约一米九，是有人选资格的，但也只能站到第三排，还站不到头二排。一天，袁世凯亲自到第六镇挑选“小队子”，冯本应去应选的，只因他为人老实可靠，勤奋好学，能吃苦耐劳，在他所在的那个连队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兵，连、排长都想把他留在本连当头目，而不愿让他被挑走。因此，在袁世凯挑选的时候，连、排长们把冯藏了起来，不让他去应选。当时冯还为此事大哭一场，因为他认为能跟袁世凯当卫士，是一条攀龙附凤、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啊。

关于袁世凯的“小队子”，笔者没见过，但在1924年和1930年，先后在北京三贝子花园（现为北京动物园），见到在园门口收门票的两个大个子，身高都在二米三左右。我的身高是一米七二，我的头只能达到他们的腋下，我得仰着脸看他们。据说，他俩的教师是当年袁世凯的卫士；袁世凯每当接见外宾时，总是要有这样的四个大个子，手执武器侍立两厢。

气死留学生

121

冯玉祥以行伍出身，由兵卒而班长，由班长而排长（那时叫做哨长），当时第六镇统制（即师长）段祺瑞，在北洋军阀中是比较开明一点的，镇内出了一个连长缺，段祺瑞就命全镇的排长举行考试，择优提升，结果，冯名列前茅，升任了连长。以后，镇内又出了一个营附（即副营长，那时叫做帮带）缺，段祺瑞又命全镇连长举行考试，结果，又是冯名列第一。当时第六镇的军官，行伍出身者占少数，大部分是军官学校毕业和留德、留日的

军官学生。考试课目，无非是典、范、令和初级战术，那些军官学生出身的人，大都是些纨绔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不会下功夫准备考试。而冯则本着“人一能之己十之”的精神，努力不懈地学习，且在实践运用上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些军官学生是无法考在他前头的。因此，当时第六镇流传着“冯玉祥气死留学生”的说法。

发誓自办陆大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我国开办最高军事教育机关——陆军大学校，报考条件是：（一）年龄在30岁以内；（二）曾在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一年半以上、现任军官者；（三）或曾服军役二年以上、少校以下、中尉以上之军官，确有现职底缺者，均得报考为学员，修业期限为三年。冯玉祥虽是行伍出身，却完全合乎报考条件的（一）、（三）两项，而且确有把握能考得上。但在报名时，那些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生出身的人们，嫉妒心切，说冯不合报考条件的第二项，坚决不让冯参加考试。其实，报考条件明确规定，除第一项以外，合乎（二）、（三）两项之一者均得报考，那些军官学生只是无理取闹而已。而冯由于势孤力单，终于未能参加考试，未能进入最高军事学府深造，引为很大憾事。冯是一个有气魄的人，当时他曾对着那班军官学生发誓说：“今天你们不让我上陆大，将来老子自己要办个陆大！”1923至1925年，冯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南苑练兵期间，虽未另办陆大，却办了一个性质和内容基本上和陆大相似的“高级军官教导团”，以陆大的老前辈段祺澍为团长，以陆大毕业的刘骥、熊斌、王乃模、崔正春、高震龙等为教官；学员则是选拔出来优秀的团、营、连、排长。1928年，陆军大学校根据冯先生的提议，除原有的正规班之外，开始添设“特别班”，专招收中将以

下、中校以上而未上过陆大的现职军官，加以补习，学习期间也是三年，不论出身是行伍或是国内外军官学生，均可报考。后来，冯同着他的西北军旧部高级将领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进入陆大特别班第三期学习，冯成了正式的陆军大学学员了。冯自己虽然没有办成另一所陆军大学，但他昔日自己要办陆军大学的誓愿，基本上也算实现了。

以德报德

冯在淮军当兵时，同班弟兄尤鹤亭，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对冯的识字念书颇有帮助，但他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后来没有当上军官就回家为民了。而冯却恩不忘报，当他做到陆军检阅使在南苑练兵的时候，就把尤鹤亭从家里请到军营中，待为上宾，并用其所长，使他轮流到各团、营对官兵讲《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等各种有趣的故事，他讲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很受官兵的欢迎，官兵们把他叫做“瞎话篓子”。冯的另一个同班弟兄谷良友，由于他曾打抱不平地护卫过冯，因此，冯对他非常感激。谷良友倒是始终跟冯在一起，在冯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曾把他由排、连长提拔到营长。但此人性情乖张，桀骜不驯，天不怕、地不怕，当排长时不听连长那一套，当连长时不买营长的账，作战时虽很勇敢，却常常不听命令，不受约束，擅自行动，因而没人驾驭得了他，后来只当过游击队大队长和高级副官，没有升到高级带兵官的地位。谷良友的胞弟谷良民，为人忠诚老实，才能也不错，在冯任西北军总司令的时候，为了酬报谷良友的情谊，曾把谷良民提拔为师长。

冯在新建陆军当兵时，营门口那位摆纸烟摊的邓长耀，在为冯的学识奠定基础上，是有不小的贡献的。因此，在冯飞黄腾达

时，邓长耀也就跟着冯当过县长、道尹和厅长等高级文官职务。冯在新建陆军当兵时，他的班长齐大麻子，由于对冯同情支持过，因此，冯对他十分敬重。冯任陆军检阅使时，曾派专人到他家里，为他置了两顷地，盖了一院房子。

以德报怨

冯玉祥在淮军当兵时的那个班长邢得胜，为人不正派，对冯不公道，才能也不怎么样，当过班长之后，就回家去了，而家景不好，生活穷困。在冯任陆军检阅使的时候，他曾厚着脸皮去找冯。冯不念旧恶，量材录用他当了马号头，来管理司令部的战马。至于那位处处与冯为难的李建堂，为人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在军队里当然混不好，老早就回家去了。冯当了陆军检阅使，李建堂不敢去找他，可是冯却派人把他请到南苑，同吃同住，亲如骨肉，呆了两三个月，送给几百块钱，把他打发回家。冯常常对部下们说：“我之所以能有一点文化水平，多亏当年李建堂对我的逼迫，否则，我不会那样地用心学习，环境条件越是不利，越容易使人追求进步，所以我应当感谢李建堂。”

基督将军

1913年，冯任团长驻防北京时，患了打背疮，经他的一位朋友刘宽（北京人，基督教友）介绍，一位美国教会医院医师为其治疗。那位美国医师在手术前和手术后，总是“阿门、阿门”地祷告一番。打背疮很快地痊愈了。冯非常感激那位美国医师和那位刘宽，美国医师和刘宽乘机敦劝冯入教。此时冯对基督颇有好感，认为他之所以很快痊愈者，也许是出自上帝之所赐。于是，冯遂即领洗入教，加入美以美会。后来，人们把冯称为“基督将军”，就是肇端于此。

与陆建章的关系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初在淮军中充伙夫（炊事员），嗣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时，被袁世凯调到新建陆军充任初级军官，由于他精明强干，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和信任，因之一帆风顺，扶摇直上，升迁非常之快，到1914年至1918年，位至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和陕西督军之职。陆建章在第六镇（师）任协统（旅长）时，冯在他的部下由士兵而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和营长。由于冯为人老成持重，实干苦干，品学兼优，才能出众，故深得陆建章的青睐器重。陆建章的夫人，系沧州刘氏，刘夫人的娘家侄女刘德贞女士，年方及笄，陆建章亲为冯介绍与之成亲。至此，陆之与冯，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亦且成为姻娅关系了。沧州刘家有四个姑娘嫁给军界要人，世称沧州刘氏四夫人，显赫一时，为时人所称羨。一个嫁给陆建章，一个嫁给冯玉祥，一个嫁给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陕西督军阎相文，最后一个嫁给历任冯的参谋长、西北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说来凑巧，沧州刘家的四个女婿，三个督军、一个省主席，都是开府于陕西。

1912年1月，冯和王金铭、施从云同在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当营长时，他们三人联合发动滦州起义，王金铭被推为北方军政府大都督，施从云被推为陆军总司令，冯则被推为总参谋长，准备率队进攻北京。但所谋未遂，王、施二人被通（州）永（永平州）镇守使王怀庆诱捕，解至北京被害。当时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陆建章任北京执法营务处处长（军法执行总监）。冯被捕后解至北京，陆建章竭力为之营救，他对袁世凯说：“冯玉祥这小子是个愚蠢人，他不会造反，而是受了王金铭、施从云的愚弄，上了他们的当，饶他一死吧。”袁世凯说：“从相貌上看，我

看冯玉祥这小子将来闹乱子是会有他一份的，不如早点把他杀了。”陆建章说：“把他交给我好了，我保证他不会出乱子。”于是，冯得以不死，受了一种“递解回籍、著地方政府严加管束”的处分。冯回到保定家中，因陆建章有函给地方政府，嘱其关照优待，故冯行动自由，未受约束。两个月后，即任保定巡防营长。民国元年（1912年），曹錕的第三镇在北京搞兵变，炮击总统府，袁世凯认为他早年训练出来的北洋老六镇，已经不可靠了，乃令陆建章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负责编练五路（相当于师）新军，冯于是被调为左路第一团二营营长，半年后升任团长。陆建章于1914年任第七师师长赴陕西就任督军时，冯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旋又改编为陆军独立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的前半生经历，确实得力于陆建章的栽培和提拔，故冯视陆建章为救命恩人。

验 内 务

北洋第六镇在练兵的时候，每星期日停止操课，整理内务、卫生，擦拭武器弹药，而由各团、营长交替检查，互相观摩，互相促进。一般团长、营长们在检查时，走马观花地看到地面上挺干净，床铺上挺整齐，枪支、刺刀挺明亮，士兵身体卫生从外表上看着也都挺利落，于是，连声叫好，打个优等分数而去。当时冯玉祥任副营长，他却与众不同，有着另一套检查方法。他一进兵舍，先到门后把笤帚拿起一看，一堆花生壳子，纸烟屁股在那里堆着；他把床铺上铺的毯子、席子一掀，脏手巾、臭袜子都在那里藏着；他到军械房，拿起枪支，别的地方不看，单看托底板、螺丝钉和枪筒里的来复线，一看，个个托底板和螺丝钉都生了红锈，枪筒里漆黑一团，根本看不见来复线；然后到院里，叫列队的士兵伸出双手，大多数的手指甲没有剪，再看看每一个上

兵的耳朵眼，大多数里面都有灰土，多数人的鼻孔内都凝结着垢痂；最后，他命士兵就地坐下，脱去鞋袜，嗨！这一下就更丢丑了，绝大多数看来好几天没洗脚，好久没有剪过脚趾甲，臭气熏天，令人掩鼻。于是，受检查的连值日官，罚跪的罚跪，挨军棍的挨军棍，人人吓得魂不附体。从此以后，各连队不怕别人验内务，独怕冯来检查。后来，西北军的验内务、查卫生，都是照着冯这一套模式来进行的。

讨伐张勋

1917年春，第十六混成旅驻军廊坊时，冯因反对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调动命令而被撤职，段祺瑞以其亲信杨桂堂接任旅长。冯临走时，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及士兵代表到火车站送行，由于部属们同冯的感情深厚，大家痛哭流涕，依依惜别，遂把冯身上穿的便装马褂撕得一条一条的，每人拿去一条作为纪念。冯避居京西天台山寺院内，韬光养晦，闭门读书，而其旧部营长以上的军官，则轮流前往探望并通报一切消息。是年7月初，张勋率其辫子兵由徐州进京，迎接溥仪复辟。冯闻讯连夜驰赴廊坊，召集旧部，宣布起义，再造共和，部属一致拥护，并将杨桂堂轰走，仍请冯任旅长。于是，冯于7月2日率师进京，首先攻入天坛。在此以前，段祺瑞亦因与大总统黎元洪政见不合而去职，住在天津，当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也即赶赴马厂，动员陆军第八师李长泰部，向北京前进，会合冯的第十六混成旅，一举将张勋的辫子兵击溃，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亦复退位。冯虽无明令复职，但因再造共和立了大功，段祺瑞无话可说了，只好默认。同样，段祺瑞本人也是以去职的身份自行复职的，两人彼此彼此，谁也不说谁了。世人皆知是段祺瑞再造共和，而其实是冯首先发难，并首立战功者，只是当时段祺瑞的声望大——

些，把冯给遮掩住了。

思罗堂——青年会

1919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南常德时，陆建章的妻侄刘某，在冯那里做客，刘某患有神经病，冯请当地教会医院——广德医院美国人罗感恩大夫为其诊治。刘某一看见高鼻子、绿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好像看见了鬼怪似的，东藏西躲地不让他给看病。当罗感恩大夫第二次又来为他治疗时，他正在室内玩弄勃朗宁小手枪，看见罗大夫，忽然举起勃朗宁，对准罗大夫的胸部开了一枪。当时冯玉祥也在室内，听见枪响，连忙上去抱住刘某的腰，刘某又对着冯打了一枪，冯的手部和肩部受了轻伤，而罗感恩大夫却因伤重而死去。冯除了极为沉痛，隆重地为罗感恩大夫治丧外，并以三千银元抚恤罗夫人，而罗夫人坚辞不受。冯先生遂将这笔款子汇到美国给罗感恩的儿子，可是，罗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要，而把款子原数退回。冯无奈，乃以此款修造了一座铁的活动房子，取名“思罗堂”，一方面纪念罗感恩大夫，另一方面作为礼拜的场所。这座思罗堂，由于是一座可以拆卸、折叠的活动房屋，所以在冯的部队移防时，总是随军迁走。1922年至1925年，冯军驻北京南苑时，这座纪念堂坐落在陆军检阅使署大门外的广场上。不过，这座纪念堂，此时改名为“青年会”了。笔者在南苑亲自见过这座青年会，它是一种礼堂的形式，可以容纳五六百人。

全军信教

冯玉祥自从美国教会医院为他治愈打背疮和罗感恩大夫治病救人、牺牲自己性命而其家属不受抚恤，他认为基督精神是很能感化人教育人的，除他自己入教信仰耶稣基督外，还倡导他所属

部队的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基督教。笔者就是于1923年在北京南苑集体领洗的，当时的牧师是余心清、浦化人两先生。在冯所属的西北军中，信仰耶稣基督信得最笃实的，要算是冯手下的首席大将张之江，他信基督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每天不仅在起床后、就寝前要祈祷，而且在每饭前亦必祷告，并且要跪下祷告，往往饭菜凉了，他还在闭着眼睛、口内念念有词地祷告着。有时他正在坐着办公，忽然心血来潮，也会发疯似地跪倒地上祷告起来。1926年，冯从苏联回来，初步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是帝国主义者作为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所以他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时候，曾发通电说，他本人和他所属的全体官兵，一律退出基督教。可是，张之江却极力反对，他本人坚决不退出，终其生一直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

西北军的信教活动，通常以连为单位，每日在就寝前，由值日官领头祷告，全连官兵俯首静默，至值日官把祷告词念完，说一声“阿门”时，大家一齐跟着喊一声“阿门”，就算完事。每星期日，以营为单位进行“查经”，所谓查经，是由营长或值日连长领导选读圣经（《新约全书》）中的某一章节，并由牧师对官兵加以讲解，然后再唱一两首《颂主圣诗》，时间约需一至两小时。各营都组织有20人左右的“唱诗班”，他们是从营中挑选有文化的优秀士兵组成的，由一位长于音乐歌唱的排长或班长领导，而由牧师负责训练。每团设有一个身着便衣的专职随军牧师。遇着大操大典，冯集合部队讲话之前，也要先作一番祷告，由总值日官领念祷告词。

“坠马摔伤”

皖系陕西军阀陈树藩，久已觊觎陕西督军的宝座，陕西督军陆建章要求停战言和，经双方协议：陈树藩将陆建章的儿子放

回，陆建章以督军的位子让给陈树藩。就这样，陆建章的陕西督军垮了台。陆建章离陕后住在天津租界，既不甘心于失败，又愤恨皖系之谋己，于是就策动他的两个旧部下：九江镇守使吴金彪（外号吴小辫）和驻在武穴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合力夺取皖系老巢的安徽地盘，得手后，陆建章即取代倪嗣冲而任安徽督军。陆建章是冯的救命恩人，又是姻亲，冯不能不出兵，但进至中途，得知吴金彪部并未出动，冯鉴于势孤力单，难以取胜，但又不便无故折回，于是冯在行军途中玩了一个坠马的把戏，说是摔伤了腿，不能行走，无法行军和指挥作战，遂即回师武穴。陆建章阴谋夺取皖督的迷梦虽未实现，却已招致皖系首领的忌恨，不久，陆建章在天津就被徐树铮枪杀了。

截粮 截款 截枪

1920年，冯所部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北礃家矶，北京政府不给发粮饷，湖北督军王占元又不能通融资助，且一再下令逐客，着冯部离开湖北境。经直鲁豫巡阅使曹錕、吴佩孚的调停，冯部移驻河南信阳。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也不愿卧榻之旁让他人酣睡，对于冯部也不接济一点粮饷。当时北京政府积欠冯部饷款达半年以上，部队困顿至极，官兵六月炎天还在穿着棉衣，天天以盐水下饭，有时竟至断炊。一天，北京政府从长沙购买一列火车的大米，路经信阳，被冯部截下留用。又一天，武汉铁路局向北京政府解送铁路税款20万元，路过信阳，又被冯部截留。冯致电北京政府，请以此粮此款补发积欠粮饷，北京政府没有理由勒令交还；几经交涉，才将截留之款交还半数。但是，杯水难救车薪之火，过了一段时间，冯部仍是无法维持生活，冯决计进占驻马店就食，因为驻马店是河南省的一个粮食集散地。适巧河南督军赵倜在汉阳兵工厂新购七九步枪

1500支，运往开封，路经信阳，被冯部截留。赵倜闻讯大怒，勒令冯部交还，否则即以武力解决。冯知道这不是和平能以解决的，不如来个先发制人。于是即派张维玺团以野外演习为名，向驻马店前进。驻防驻马店的赵倜所部李鹏举团，侦知冯部来意不善，坚不相让，遂起冲突。打了半天，李团终于战败投降，冯部又缴获了一千多支崭新的汉阳造步枪。赵倜据报，十分气恼，决定以武力解决，其部下老毅军师长、归德镇守使宝德全，自报奋勇打前敌，军旗上写着“包打冯玉祥”的口号，由开封经郑州向驻马店攻击前进。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闻讯后，急令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令冯部把截留和缴获的枪支原数退还。胳膊扭不过大腿，冯只得遵命办理，但却以旧有破烂枪支，顶替新枪交还，赵倜不受，坚要新枪。吴佩孚遂又严令冯亲赴开封，面见赵倜，表示歉意，以求和解。冯在吴佩孚的压力下，不得不低头屈从。没隔好久，曹锟、吴佩孚即命冯部由信阳开往陕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赴开封就任河南督军时，一下火车，就把前来车站迎接冯的那位毅军师长宝德全枪毙了。赵倜早已跑往上海去了。1922年在北京南苑，有一次笔者听到冯在讲话时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前我当旅长时，去见河南督军赵倜，我向他行了三个鞠躬礼，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现在我当了陆军检阅使，去见大总统黎元洪，也要行三个鞠躬礼，可是，一鞠躬还没完，黎元洪可就拉住让我坐下了。”

练 官

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信阳时，名义上是一个旅，而实际上它比一个师的人枪还要多，它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团，一个辎重营，一个学兵大队（两

个连)，一个炸弹连和一个手枪队，共一万多人。但它对外只说是几千人——9999人。冯玉祥在练兵时，十分注意让士兵牢记其各级直属长官姓名，他每到连队视察或点名放饷时，必问士兵：旅长叫什么名字，团长叫什么名字，营、连、排长叫出什么名字，等等。而冯本人，则对全旅官佐士兵一万多人，他却一个个都认识，大多都能叫什么名字。有一天，冯集合全旅部队讲话，他向全体官兵问道：“你们说，我们在这里是练什么的？”大家齐声答：“是练兵的！”冯笑着说：“不对！我们在这里不是练兵，而是练官的。”的确是这样，后来西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的时候，当年十六混成旅的士兵，差不多全都变成了军官，他们成为西北军的骨干。

车轮点名和讲话

冯在南苑练兵时，每月一日点名放饷，冯本人和各旅、团长任点官，分别到各旅、团去点名，但本旅、团的旅、团长，不点本旅、团的名，而是轮流到别的旅、团点名，以便互相考察，互相监督是否有吃缺空和截旷的。此外，每逢星期天，各旅、团、营长分别轮流到各旅、团、营去讲话，促使全军官兵对全军营长以上军官都有所了解认识，而便于在战时好配合作战。他们在讲话之前，先查验武器、内务和卫生。然后集合队伍进行查经——即作礼拜，选读《新约全书》的某一章节。最后才是讲话，讲话的题目和内容，由讲话人自定，有的还把讲稿加以印发。

理 发

西北军，上自冯玉祥，下至每一个官佐士兵，一律不准蓄留头发，一律剪光或剃光。理发的时间，以连为单位，要理一齐理，不许出前或落后，一般三个星期理一次。理发时，无论官长

或士兵，都不许到外边理发店，每个班都有一套理发工具——推子和剃刀。冯曾经下令，要官给兵理，兵给官理，官给官理，兵给兵理。

军人必读

冯自当旅长起，就组织他的幕僚们编写了许许多多军人必读的通俗读物，如《六百字课》、《精神书讲义》、《军人宝鉴》、《军人读本》、《实战见闻录》、《心范》、《战阵一补》、《军人新教育》、《义勇小史》、《军士勤务书》、《带兵规则》、《简明军律》、《用间篇》、《八、九两年纪实》、《历史小故事》等。

军歌

冯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由士兵到西北军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军中生活达五十多年。由于他久历戎行，无论是带兵、练兵和用兵，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亲身阅历，他根据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亲自编写许多种类的军歌。例如部队在作战时，士兵不知节省弹药，无的放矢地乱放一通，及至危急的时候，没有弹药了，以致吃了很大的亏，于是他就编写了一首《节省子弹歌》。其他一些军歌，也都是有所本而写的。那些军歌，采用《颂主圣诗》的曲谱，令官兵常常挂在嘴上，记在心中。军歌很多，兹简举如下几个：早起歌，戒晏起歌，吃饭歌，卫兵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战斗动作歌，枪口不准堵东西歌，爱民歌，国耻歌，爱惜光阴歌，模范军人歌，行军歌，火车行军歌，水上行军歌，忠烈歌……。每早起床后，以连为单位，必唱国歌。至于军歌的内容，由于过繁，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兹将《爱民歌》全文录下，以概其余：“有民尔后有国，养兵所以保民，兵民原属一体，理宜相爱相亲。秋毫

无犯，贤哉岳军。切戒滋扰，仗势凌人！切戒滋扰，仗势凌人！”

饭前认字

冯在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专为没有上过学、念过书的文盲士兵，编了一个识字课本，叫做《六百字课》。各个连队在开饭前十分钟，把全连士兵集合起来，由连值日官教认一个生字，这个生字写在一块黑板上，让士兵比葫芦画瓢地用竹棍在地上学写。这样，一天认两个字（西北军每天两顿饭），一年就可把600字认完。认完这600字，就可以阅读简单的书报、写简单的书信了。这种饭前认字的办法，一直到西北军全盛时期还在施行。

肖像

冯从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起，就把他的肖像制成一个好似现在的工作证那样的小本本，布面烫金，印有“冯玉祥肖像”五个字。本内左页，白色道林纸印着冯身穿陆军将级大礼服、免冠半身坐像的照片。本内右页，白色道林纸印着几行字：圣经警句：“凡得着生命者必丧失生命，凡丧失生命者必得着生命。”这种肖像本本，发给全体官兵人手一册，无论平时战时，都要带在军服上装右边口袋内。肖像本的布面，按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分制成红、黄、蓝、白、黑五种不同的颜色。此种章法，冯在南苑练兵时，一个师（十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第八、第二十五）共五万多人，还在继续着，但到冯从苏联回国后，就停止了。

新决心

冯从当十六混成旅旅长起，直到当陆军检阅使，在练兵期间，他所属的部队全体官兵，每人床头墙上悬着一个长约十分、

高约七公分，叫做“决心牌”的白色硬纸牌，牌的上端横写“某某人新决心”，下面竖写几条新的一年内要求达到的目标，例如某士兵是这样写：“一、为国祈祷，二、崇尚节俭，三、爱惜光阴，四、《精神书》读本，五、认完《六百字课》，六、体操练好三大件（屈伸上、摇动转回、倒立下）。”这种决心牌，每年元月更新一次，决心的内容，除头三条不变外，其他几条则随着要求的进度而变换。

学 画

1922年，冯任河南督军时，曾把他自己的作息时间表发到部队传阅，其中除办公、会客、练兵、视察之外，还有几项学习课目，如读书、习字、学英文、学画画等。一天，有一位政界官员去见他，看见冯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墨迹未干的楷书大字，那位官员立即把手中拿的一把白纸折扇递上，请冯给他题几个字。冯并未推辞，就给他写上一首略加改动了一下的《水浒》上的诗：“六月炎天似火烧，地里庄稼半枯焦；农民心中如汤煮，大人先生把扇摇。”那位官员接过之后，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另一天，有一位政界官员，坐着黄包车去冯处，看见冯正在学画画，画的是一把小茶壶。于是那位官员拍马捧场地请求冯先生随便给他画一幅画，以作纪念。冯立即挥毫给他画了一幅讽刺画，画的是一位神气十足的官老爷，鼻孔朝天地坐在黄包车上，一个车夫拉着黄包车，正在弯着腰向前奔跑。冯还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所谓“丘八诗”：“一人坐车一人拉，同是人类有牛马，重层压迫真可叹，惟盼仁者来救他。”那位官员看了之后，尴尬得坐立不安，口里还不得不说“画得好”，连声道谢。

从冯的作息时间表上看，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安排得异常紧迫，连午休算上，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冯的司令部所在的营

院内，住有他的手枪队和学兵团，冯在夜间就寝时，常把床铺搬到手枪队或学兵团的门口，以便队伍早晨起床时把他吵醒，而不至于睡过了头。古今名将，不仅才略异众，亦且精力过人，信然。

关 心 学 生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到开封就任河南督军。当时百废待举，百端待理，而不出一个星期，冯就偕同教育厅长李步青和省长张凤台，亲临当时开封的最高学府——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笔者当时正在这个学校的法文科上学），去和全校学生及教职员见面并讲话。讲话的要旨是，勿忘国耻，发奋图强。到了那年的“双十节”（当时的国庆节），冯在开封南关演武厅举行阅兵典礼，特邀开封各学校学生共五千多人，参观阅兵并参加会餐。会餐是每人一碗豆腐、白菜和两个棒子面窝窝。阅兵、会餐之后，又让学生们参观军营内务。记得那年夏天正热的时候，冯还把学生邀集到马道街一家叫做“丰乐园”的戏院里，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学生讲话。张伯苓的那次讲话，多数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曾问学生们：“热心热脑，冷心冷脑，冷心热脑，热心冷脑”，这四句话哪一句是正确的？张伯苓讲罢话，冯也讲了几句，他说：“我是个军人，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你们是有学问的人，听了我的话，可不要笑话。我这个督军，不是做官当老爷的，而是民众的公仆，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我办，我一定尽力给你们办。”那时正是盛暑，天气很热，冯在讲话时，他的卫士拿着葵扇在他背后给他扇凉，冯立即挥手叫他那个卫士走开。那时，不仅冯个人时常接近学生，他还让他的部将如张之江、鹿钟麟和文官薛笃弼等，时常到各个学校或公共场所为学生们讲演。

君子之交淡如水

1923年，吴佩孚在洛阳大庆五十寿诞，各地大员拍马唯恐不及，贺礼生怕太薄。湖北督军肖耀南，送去的是用黄金制成的一座金村；河南督军张福来，送的是用白银制成的一座银城；其他有送金佛爷、金寿星的，有送珠、宝、字、画古董的，奇珍异宝，不可胜数。唯独冯玉祥别开生面，他派专人给吴佩孚送去了一坛清水，并亲笔在坛子上写了“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八个大字。吴佩孚一见“大喜”，说：“知我者焕章也！”并且当着众贺客说：“这次所有礼物，以此为最上品，其余不足道也。”其实，吴佩孚是最恨冯的，恨冯不买他的账。

手枪队和学兵连

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1支、子弹100粒，六五勃朗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做“大刀队”。它的性能和任务是，平时作为司令部的警卫部队；战时，冲锋陷阵、夜袭敌营、重点突击，在一般部队不能取胜的时候，就把手枪队当作王牌使用上去。因此，它的训练也和一般部队不同，训练要求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更严，因而他们的武艺比一般部队是要高超一些。这个手枪队，随着西北军发展壮大，由连队扩充为营，由营扩充为团，最大的编制为手枪旅。西北军，不独冯的司令部才有手枪队，凡是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有手枪队的设置。到后来，不独手枪队才有大刀，凡是西北军

的部队也都有了大刀，1933年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的赵登禹步兵旅，在喜峰口附近，绕道迂回，夜袭敌人后方部队，就是不放枪而专用大刀砍，杀死砍伤日军服部旅团六七百人，吓得日军连忙赶制钢质项圈，套在兵的脖子上，以防大刀砍掉脑袋。

冯在当十六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他所招来的兵丁，农村青年居多，那时候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很少，大多数都是文盲，所以军中的知识青年是很宝贵的。因此，冯就把那些知识青年集中起来，编成学兵连（又叫做模范连），加以特别训练。其目的是为培养一般连队中的军士（即正副班长），它和各团营所办“特别兵”讲堂的性质差不多。不过“特别兵”是为了培养各自团营军士的需要，而学兵连则是为了扩充队伍时需要大量军士而预为之备的。因此，学兵连的编组，也是随着西北军的发展壮大，知识青年越来越多，逐步由一个连扩大为两个连，由两个连扩大为营，由营扩大为团。到后来，西北军的每一个军，各自都编组有学兵营或学兵团。

金蝉脱壳

冯玉祥就任陕西督军后，由于陕西本来就不富庶，加上陕南道被军阀吴新田割据着，陕北道被军阀井岳秀割据着，只剩下关中道，还被省长刘镇华和大小土著军阀分片霸占，冯手里只掌握了七个县，不要说养活全省许许多多的军队，就连他自己的第十一师的粮饷也难以维持。适值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冯主动请求辞去陕西督军职，愿赴前线杀敌。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允如所请，战后以河南督军位置相酬。河南远比陕西富庶，又无别的军队需求粮饷，于是冯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开封兵工厂昼夜加班，赶制武器弹药。除了原有的第十一师外，

不到半年时间，就增加了六个新兵团，名义上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这就招致了吴佩孚的大忌。吴看到冯野心勃勃，其志不小，为免养虎贻患计，就免去了冯的河南督军职，调任一个空头衔陆军检阅使。所遗河南督军缺，由吴佩孚的嫡系亲信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接任，并命令冯只许带走第十一师，而不许带走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的六个新兵团。吴佩孚还密令张福来严阵以待，如果冯要带走六个新兵团，即以武力截留。当时吴佩孚位尊势大，冯只好忍气听命，离豫赴京。但是，关于六个新兵团的去留问题，吴佩孚却被冯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的把戏给愚弄住了。冯令六个新兵团打着第十一师的旗号，由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率领，先行开拔，由开封经郑州，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地向北京开去。张福来见是第十一师的部队，当然放行，不能截留，并且还李鸣钟旅长以礼迎送。六个新兵团过完，真正久经战阵的老兵第十一师，由老将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率领着开来了。张福来打听清楚之后，始知这是真正的第十一师，才知道先头开过去的是冒充第十一师的六个新兵团。这个真正的第十一师，其战斗力之强，张福来深知不是第二十四师所能解决得了的，所以他没敢动手，只好仍然放行。后来吴佩孚跺着脚把张福来大骂了一通。

吴佩孚把冯部调到京城附近，因没有地盘，当然就没有粮饷来源，以为不要多久，就会使冯部匮乏崩散。可是，冯到了北京之后，却大受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欢迎。原来黎元洪手里没有武力，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傀儡大总统，冯带着四五万人马，来到他的跟前，他如能抓到手里，就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马上把冯的那六个新兵团，编为正式的中央陆军，给以第七、第八、第二十五等三个混成旅的番号，同冯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师，统受陆军检阅使的直接节制指挥，并给以每月可以收入一

二十万银元的北京崇文税关，作为军饷基本来源。就这样，冯得到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安定环境，专心致志地把部队整训了三年。这三年，成了冯训练部队的黄金时代，为后来西北军的大事扩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讲堂 教导团

冯在常德、碓家矶、信阳、西安、开封和南苑练兵的时候，除连队设有士兵讲堂、由本连队官长任教外，以营为单位，设有军士讲堂，由营长、副营长、连长任教员，课程是兵科教程、典、范、令和《军士勤务书》。为培养、储备军士人才，以营为单位还设有“特别兵”讲堂。所谓特别兵，是从各连队挑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体格比较强健和比较聪明伶俐的列兵，加以集中训练。以团为单位，设有初级军官讲堂，由团、营长任教员，课程除典范令之外，还有初级战术，《曾胡治兵语录》和《求阙斋日记》等。在冯的司令部里，设有营长以上军官讲堂，由各级幕僚长任教员，冯本人和各旅长们有时也参加讲课和听课，课程除《曾胡治兵语录》、《求阙斋日记》外，还有中、高级战术、《戚继光语录》、《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左传摘要》、《赵注孙子十三篇》等。此外，在冯的司令部里，为培养储备初级军官，还设有“军士教导团”，轮番抽调全军比较优秀的班长，集训半年至一年。为培养储备中级军官，设有军官教导团，轮番抽调比较优秀的连、排长集训半年至一年。为培养将材和高级幕僚，还设有高级教导团，抽调部分比较优秀的排、连、营、团长，学习时间一至二年。

不扰民 真爱民 誓死救国

冯鉴于军阀部队之军纪败坏，扰害百姓，天怒人怨，他在任

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就非常注意军纪，凡违犯军纪者必加严惩，不稍宽贷。但他并非不教而诛，而是从教育着手。冯从来不收在其他部队当过兵的老兵油子，他所招的新兵，必须是一头高粱花子的农民。新兵入伍后，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保卫国家爱惜百姓。为此，冯亲自编撰了一首叫做《训兵歌》的军歌，歌词是：“有志新兵尔要谨记，当兵须知守本分。保卫国家，爱惜百姓，兵与人民一体生。食民膏，衣民脂，尔尽知民间困苦。重勤俭，重品行，不可忘保护商民。”还有一首叫做《爱民歌》。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班师回京推翻曹锟、吴佩孚的时候，他又提出这样的口号：“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并把这个口号写在半径约四厘米的圆形白市布上，缀到缠在每个官兵左臂的红色袖章上。到1926年，冯从苏联回国后，西北军的部队，每天早晨必须举行朝会，冯亲自拟定了在朝会上的问答口号，如问：我们是谁的军队？答：老百姓的军队！问：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国家，被人家几千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欺负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是谁的责任，谁的耻辱？答：是军人的责任、军人的耻辱！问：我们应当怎么办？答：保国卫民，复仇雪恨！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等等。

大家庭

141

冯在常德、信阳、西安、开封和南苑练兵的时候，历年以来，除举办各种军事教育组织以外，还举办了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小学和军眷妇女学校——培德中、小学。此外，各旅长、团长各在驻军附近的市镇上为当地居民举办义务小学。在平时练兵期间，各级官佐准许携带家眷。他们的配偶，一般都是原籍农村妇女，很少在驻军当地“就地取材”的。在军中结婚者，冯送给一架织布机、两袋面粉和50元钱。蜜月过后，新妇就得

进培德学校学习。学习课日除学文化外，还须学织布、学缝纫。军官眷属宿舍（包括冯本人）都不在营房之内，而是在附近的营市街上租赁民房。有眷属的军官，不许随意外宿，以营为单位订有轮流回寓时间表，每人每周外宿一次，晚上熄灯号以后离营，早晨起床号以前回营。在南苑时，冯先生和五位旅长，时常轮流到军官子弟学校和军眷妇女学校视察、讲话。有一天，冯先生同他的参谋长刘骥，远远望见几个军眷妇女，穿着短装外出，冯就对刘骥说“刘参谋长，你去管教管教她们，要她们外出时一定要穿上裙子。”刘骥说：“我当参谋长，只能管军队公务，怎好管眷属家务呢？”冯说：“你这话错了！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家庭，军眷也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而你我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当家长的为什么不能过问家庭成员的事呢？”几句话，说得刘骥口服心服，马上骑着自行车，追踪管教她们去了。

劝 忠 祠

冯在他历年驻军的地方，如常德、信阳、西安，都曾设置一个占地数十亩的陵园，专为埋葬阵亡将士和病故官兵。陵园围一透花院墙，里面遍植松柏，坟墓横竖成列，每一坟前树立一通小石碑，碑上端镌刻一个十字架，下面刻着死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和生前所在部队番号及职务。每一死者，有葬埋费 15 元。陵园正中，修建一座庙宇式的厅房，叫做“劝忠祠”，由冯亲书颜体楷书斗大贴金的匾额，悬挂在祠堂大门的上方（冯晚年改写隶字）。祠堂内陈列着死者的牌位。祠的四壁悬挂着旅、团、营长所献的匾额或楹联，如“浩气常存”、“精神不死”、“气壮山河”、“山高水长”、“英风凛然”、“虽死犹生”等。祠堂门前树立着一通冯写的“祭文碑”。每届春节和清明节，冯必亲临陵园祭扫、凭吊，各部队长和士兵代表也纷纷前往致祭。

沟垒比赛

西北军在平时练兵期间，每年阴历除夕前一两天，趁着夜间没有月亮天气最冷的时候，进行一次沟垒（战壕）比赛。1923年那一次，是在南苑大操场举行的。以团为单位，每团出三个营，每营出四个连，每连出官长四员、士兵100名，不准多，也不准少。十五六个团分布在一个大操场的周围，每一个团所挖沟垒的幅度，就是实战时一个团应该担任的防御地段；沟垒的深度，是立姿散兵壕。白天，各个团按照检阅使署参谋处统一规划的图案，用石灰经始画线后，团长带着营长，营长带着连长，连长带着排长、班长，班长带着列兵；挨次查看地段，布置任务。入暮后，6点半钟开始，次日凌晨3点钟停止，共进行八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就地吃一顿夜餐。竞赛指挥部的绿色信号弹升起，一齐动工，红色信号弹升起，一律停工，做不好，不许整修，做不完，也不许再做。动工期间，不许说话，不许点马灯，不许擦火柴，不许打手电筒。只听见扑通、扑通的一片凿地声和叮叮当当的工具碰击声，只看见铁器碰着石头迸出一闪一闪的火星，其他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由于北京的气候比较寒冷，腊月间的地冻厚度，一般都有一二尺，要用铁锹、铁镐撬开它，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每个连队都是在铁匠炉上把两根铁杠子的两端，拧在一起，打成铁锥；每个铁锥由四个人分头攥着两根铁杠的中部，齐力凿掘地面的冻层，冻层掘开之后，铁锹、铁镐才有用武之地。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正在用手挖土的人，有被铲土的铁锹断手指的，有被凿地的铁锥戳伤脚面的，也有碰破头、伤着臂、伤着腿的，整个说来，受伤的数目是以百计的。在比赛动工过程中，自冯以下各级军官，统统亲临现场，巡视督饬，而连、排长除指挥外，都同士兵一道参加劳动。尽管天寒地

冻，由于操作紧张吃力，凡是参加操作的官兵，都把棉衣脱掉，只穿衬衣，还是热得汗流浹背。次日天亮后，冯亲自领着几位旅长和参谋人员，评判优劣。结果，那次比赛，第八混成旅第二团名列第一，除了对该团全体官兵颁发荣誉奖和物质奖以外，还奖励给团长张维玺一座直径 50 厘米、高达 100 厘米、紫檀木架子玻璃罩的大银杯。这座银杯原来是溥仪送给冯的，作为奖品，十分珍贵。1927 年，张维玺任西北军第十三军军长时，在甘肃天水举行了一次全军运动会，会上进行了营长以上军官 400 米赛跑，营长蔺九洲取得第一名，张就把这座银杯转手奖励给蔺九洲了。1930 年，蔺九洲任团长时，在陕西安康作战阵亡，这座银杯就不知落到何处了。

此外，冯平时练兵，每届年终，总要举行一次“年终校阅”。举凡学科、术科、内务、卫生、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包括战斗射击），都要来一次大检阅。连与连比，营与营比，团与团比，旅与旅比，优胜个人和团体，都有奖励。奖品除书面通令嘉奖外，团体者有锦旗、银杯、银盾和奖金；个人、军官多为文房四宝和成套装箱的木工工具或铁工工具等；士兵多为衬衣、鞋袜、毛巾和牙刷、肥皂等。

冯在平时练兵时，每年开一次全军运动会。后来，西北军的各部队，以军、师或旅团为单位，每一年或半年开一次运动会。有一年的春季全军运动会，是在北京景山公园举行的。竞赛项目，除一般运动会所进行的田径、球类、体操等以外，还增加了许多军事运动，如战术竞走，勺蛋竞走，瞄准竞走，骑牛竞走，自行车慢行竞赛，着装竞走，武术竞赛，劈刺竞赛，射击竞赛，人梯竞赛，障碍通过竞赛等等。奖品有锦旗、锦标、银杯、银

盾、奖章、纪念章和衣物用品等。

三 节 两 年

西北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田间，他们的宗亲观念和传统的民族节日风俗习惯，相当浓厚。冯洞悉这种情况，故每逢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阳历年，都要休假一天，停止操课，让官兵好好过节和休息。到了阴历年（春节）则休假三天，或看戏，或开运动会。清明节，每一官兵发给一个信封、两张信纸和一枚邮票，让他们都要写封平安家信寄回去。信封是特制的，上面彩色印着“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两个画面，以示不忘孝亲之意。端午节，习俗吃粽子，但部队里那么多人，一时做不出那么多的粽子，各连队都是以糯米加枣子和白糖，煮成很稠的甜米饭，吃起来和粽子不差啥。中秋节，则是吃月饼、水果和花生、瓜子之类，有些连队不买月饼，自己以白面加糖馅蒸成甜饼，以代替月饼。阳历年，一般是吃一顿肉，打打牙祭。惟阴历年既要吃肉，又要包饺子。那时候，西北军还没有文工团之类的组织，部队看戏，是从北京租来的剧团演出的。演出的节目，都是富有教育意义，所谓忠孝节义之类的历史剧，如《空城计》、《长坂坡》、《杀西门》、《古城会》、《宁武关》、《捉放曹》、《铁公鸡》、《岳母刺字》、《打渔杀家》等等。每一出戏在演出前或演出后，由值日营长对官兵观众讲解剧情及其教育意义。有时冯也到剧场同官兵一起看戏。

革命军人朝报

冯在南苑练兵时，办了一份报纸，叫做《革命军人朝报》。冯常讲：朝气锐，暮气归，军人要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所以这个报纸就叫做朝报。它是三日刊，每期对开一张。内容包括：通令、

训令，教育训练，军纪风纪，奖赏惩罚，人事调动，内务卫生以及其他。有时还有图片，这种报纸，一直发到最基层每班一份。

军人工艺实习厂

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时，设立了一座军人工艺实习厂，由第八混成旅第一团团长石友三兼任厂长。厂分织布组、织毯组、织袜组、毛巾组、制鞋组、肥皂组、饼干组、罐头组、铁工组、木工组等。技术指导，系聘请专家担任，工人则是从各部队士兵中选拔而来，共有 500 人。生产出来的成品，并不对外发售，专供部队自用。此外，各部队以营为单位，设立小卖部，除发售上述军工厂各种产品外，还备其他一些日用百货和油条、肉包、馒头、白糖、糕点、水果、汽水等。这是因为部队经常吃的是大米或小米，有些官兵很想吃点其他食品调剂一下生活。各部队以连为单位，还设有洗衣房和修鞋组，由士兵轮流值勤，而为大众服务。

同时，冯的司令部内，还附设着一个随军银行，专为官兵便于储蓄和汇兑而设。这个随军银行，是天津“金城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

兵舍规则

冯在平时练兵时，订立有各种规则，通令全军遵照施行。如兵舍规则，讲堂规则，厨房规则，厕所规则，澡塘规则，病房规则，卫兵规则等，每项内容繁琐细密，这里只举兵舍规则为例。兵舍规则有“十二不准”和“十二要”。十二不准是：一、不准大声喧哗，二、不准弹唱词曲，三、不准酗酒赌博，四、不准吸烟吸毒，五、不准结盟立会，六、不准打架斗殴，七、不准随便睡卧，八、不准擅自外出，九、不准涂抹墙壁，十、不准乱钉桩橛，十一、不准随地吐痰；十二、不准偷看淫书。十二要是：一要服

从命令，二要尊敬上级，三要和睦同伍，四要互相帮助，五要遵守制度，六要严守纪律，七要保持整洁，八要保持静肃，九要注重公德，十要爱惜公物，十一要讲究卫生，十二要努力读书。

三 礼 二 要

冯不仅善于练兵，而且善于带兵。他常讲：带兵以得兵心为第一要义。带兵必须爱兵。视卒如子弟，则可与之赴沟壑；视卒如赤子，则可与之俱死。他还常讲：带兵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必须做到“三礼二要”；三礼就是：夏不挥扇，冬不衣裘，雨不张盖，二要就是：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兵爨未熟，将不敢食。他又常讲：为将之道，用威莫如用恩，用恩莫如用礼。冯常常在部队开饭的时候，突然来到某一连队，和士兵蹲在一起吃饭。有一天，他突然来到十一师工兵营第四连，看见士兵们的下饭菜是豆腐白菜，他就到连部里，把连、排长们的菜盆用筷子搅了几下，说：“噢，也是豆腐白菜！”如果他们的菜盆里有肉，那他们就要挨一顿军棍了。又有一天夜里，部队就寝熟睡后，冯悄悄地去到一个连队的伙房里，挤在炊事员的床铺上睡了一夜，天亮后，炊事员们才发觉是冯睡在那里。冯到医院慰问伤病兵的时候，除送给鲜花和慰劳品以外，还常常亲自为伤病兵抹澡、搓背、洗脚、理发和剪指甲，并且不是摆摆样子，而是真干实干，一干就是大半天，做得很细致。

壁 画 标 语

西北军在平时练兵时期，驻军营房的各处墙壁上，绘画和书写许多富有军事教育、战斗精神的历史故事和标语。绘画如：“苏武牧羊”、“玄高犒师”、“闻鸡起舞”、“乘风破浪”、“完璧归赵”、“陶侃运甓”、“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龟兔赛跑”、“伍

子胥过昭关”、“申包胥哭秦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标语如“我不杀敌人、敌人必杀我”，“我不以死救我国，则我国必作敌人奴隶”、“敌人越是顽强，越是好敌手”、“炮弹飞来时，正吾人开欢迎会之时”、“臭皮囊早晚亦得脱去，但看它是豪杰脱去否”、“忧劳可以兴国，逸娱可以亡身”、“悔改上要用工夫，过则勿惮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复于无过。禹闻善言则拜，子路闻过则喜”、“谦受益，满招损”、“作善降百祥，不作善降百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军纪者命脉也，人无脉络必死，军无军纪必亡”等。

夏令营

冯在平时练兵期间，每年暑期举办夏令营。每年举办三期，每期三个星期。1923年和1924两年夏令营的地点，是在距离南苑不远的清代皇帝避暑夏宫的“团河”，那里林木茂盛，风景优美，楼台亭榭，富丽堂皇。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的校址就设在团河。夏令营由冯亲自主持，参加人员为副营长以上的各级军官，分三期轮流前往。这种夏令营，是一种让军官们度假、休息、避暑、疗养的性质，生活比较轻松愉快。每天除规定读书体操和集体活动的一定时间外，都是自由活动，如下棋、打球、钓鱼、游戏、散步等。冯还特邀一些名流如黄郛、王正廷、王宠惠、颜惠庆、顾维钧、蒋方震、蔡元培、张伯苓等，来作国际时事或其他专题讲演。尤鹤亭先生也常来讲些令人发噱的故事。在夏令营里，伙食也比平常要好一些。

棒打不散

西北军的嫡系部队，都是冯一手训练出来的。他既不要外来的军官当他的部下，外来的士兵当他的士兵，也不愿经他训练出

来的军官和士兵被别的部队所收留、所利用，以免他那一套带兵和练兵的方法被别的部队学了去。因此，他的部下军官有犯过失而被撤职的，他是不让离开的，在他的司令部里，设有一个“差遣处”，凡是被撤职的军官，都集中那里加以教育训练，三五月后，遇有同级缺出，就让他们补缺复职。例如在南苑练兵时，十一师二十二旅四十三团上午收操回营后，不到一个钟头，团长韩复榘就又命号长吹出操号，吹过三遍号，不见队伍出动，韩复榘就把三个营长叫去责问：为什么不出操？一营营长冯治安和三营营长吉鸿昌，都说是队伍还未吃完饭。韩复榘说：为什么不抓紧时间，为什么不听号令？冯、吉二营长都说：是不是团长把时间弄错，提前了半点钟？其实，是韩复榘把时间弄错了，上午收操太迟了。但是韩复榘自以为是，坚持不认为是自己的错，反而以为营长们有意同他闹别扭。于是，他就跑到冯那里，把指挥刀往地上一撂，说：“冯、吉二营长不服从我，我不干了！”为了维持上级的尊严，冯就把冯、吉二营长都撤职了。可是，一个月后，冯治安又当上了营长，三个月后，吉鸿昌也又当上了营长。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汝明，在十六混成旅当营长的时候，因犯过失而被撤差，撤差后，他开了小差，过了几个月，他自动地又回部队来了，冯把他降为伙夫，可是他当了半年伙夫之后，仍又恢复了营长职务。

149

续 弦

1923年冯夫人刘德贞去世后，留下二儿三女，都在稚年，须人扶持。部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再三怂恿敦劝，冯渐有续弦之意。冯在北京练兵时，司令部设在两下里，一在南苑，一在城内旃檀寺，冯有时在南苑住，有时在旃檀寺住。在旃檀寺住的时候，星期日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礼拜。当时李德全女士是北京基督

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由于冯常到青年会做礼拜，二人时常见面，熟识了，经过多次深谈，互相了解之后，情投意合，两厢情愿，一个决定续弦，一个放弃独身主义，于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时冯42岁，李夫人28岁。后来，李夫人生了一子三女，男名洪达，长女名理达，次女名颖达，三女名小达。

体 操 团

西北军的官兵，非常注重体操的训练，而在体操的各种项目中，最注重的是单杠。副兵不会“屈伸上”不能升正兵，正兵不会三大件（屈伸上、摇动转回、倒立下）中的两件，不能升班长。士兵们为了练好单杠，每晚就寝前和每早起床后，要练基本功——拿顶和拔杠子，拿顶要连续拿100次，拔杠子练举腿上、曲肘上和吊背悬垂，也要多达百次。冯为了预防各级军官、特别是那些文质彬彬的军用文官做官当老爷久了，就不锻炼体力了，于是他把全军的各级军官和军佐，编成一个“官佐体操团”。在南苑练兵期间，以见长体操的十一师炮兵团团长孙连仲，任官佐体操团团长。体操团下分若干队，以见长体操的其他团长或营长任队长。每月集中训练一次，并由冯亲自检阅考核，连老将张之江也不放过，冯派人扶住他练习屈伸上。冯自己也在练，由马弁帮助他练习。那时的团长孙连仲、石友三，能在铁杠上拿大顶；营长梁冠英能在铁杠上打车轮；营长冯治安能在铁杠上拿着大顶、一气唱完吃饭歌：“盘中粒粒都是辛苦，民脂民膏来之不易，雨露滋长出自上帝，主恩所赐感谢靡既。”

门 标 灯 标 午 炮

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时，除第七混成旅驻在东苑（通州）外，第十一师和第八、第二十五混成旅共三四万人，统统驻在南苑大

操场周围的营房内。检阅使署、师部、各旅部、各团部和各独立营营部的营门上，都挂着各自番号的门标，为的是便于识别各部驻地的位置。夜间门标不易看见，则用灯标显示。由于军中经费短绌，营中安装不起电灯，故灯标用的是红绿两种颜色的煤油马灯。检阅使署（师部附设于检阅使署）的灯标是，中间一红、两边各一绿，并排悬挂在营门口上方正中的铁架上。旅部、混成旅是上红下绿，步兵旅是左红右绿。团部是一盏红灯，独立营部是一盏绿灯。那时候还没有广播电台，没有收音机，校对时间是用“午炮”，每天到了正午12点，由检阅使署放一响午炮，全军一齐奏午号，部队一齐对表，因此，全军的时间是很一致的。

枪毙李彦青

李彦青本是曹锟的一个变童，在曹锟任第三师师长和直鲁豫巡阅使的时候，他任曹锟的军需处长，在曹锟当大总统的时候，他任总统府收支处处长，其权力凌驾于财政部长之上。曹锟批发的公款或私款，谁要是不向李彦青行贿，那就别想把款子拿到手。有一次，曹锟批发给冯部十门苏罗通野战炮，李彦青竟扣留不发，索贿十万银元。冯就向曹锟揭发此事，曹锟严令李彦青发给。十门大炮倒是发给了，但是，十门大炮上的瞄准镜却被留下了。大炮上如果没有瞄准仪器，那就等于一个人没有眼睛。当时冯部经济极端困难，而眼看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急于把这十门大炮的瞄准镜弄到手，几经讨价还价，还是东拉西凑地给了他八万元，他才把瞄准镜交出。后来，冯先生发动北京政变时，班师回京，首先逮捕了李彦青，在追出几十万元赃款后，把他枪毙了。那时候的财政总长是后来当了大汉奸的王克敏，他扣押冯部军饷达半年以上，冯向他索要，他推托国库空虚。后来，在逮捕李彦青的同时，曾经分兵逮捕王克敏，官兵们本已碰上他了，

但是由于不认识他，被他使了金蝉脱壳计给逃脱了。后来，在日军侵华战争时，王克敏当了大汉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没能逃脱法网而被镇压了。

五 虎 将

冯任陆军检阅使在南苑练兵时期，他的部下有五个旅长，人们把这五个旅长比作刘玄德的“五虎将”。这五虎将是：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刘郁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张之江，字紫珉，河北省盐山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连长，参谋，营、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国民政府国术馆馆长，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李鸣钟，字晓东，河南省沈丘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连、营、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绥远都统、甘肃军务督办。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连、营、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热河都统、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郁芬，字兰江，河北保定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参谋、旅参谋长、团长，后来历任师长、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府主席、汪伪政权参谋总长。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县人，先是行伍出身，后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毕业，曾任排、连长，参谋、旅参谋长、团长，后来历任旅长、师长、军长、代理西北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军法执行总监、冀察战区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兵役部部长，解放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郑 州 会 师

1927年北伐战争时，西北军由五原转进陕甘，东出潼关，和在郑州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会师。武汉国民政府军政要人谭延闿、汪精卫、唐生智等先到郑州，在陇海路火车站迎候冯玉祥。冯的专车到达车站后，警卫部队纷纷下车站队，车上的人下完了，仍然不见冯下车，于是谭延闿就向刚下车的警卫部队队列排头一个全副武装的大个子士兵问道：“冯总司令在哪里？”那个大个子士兵连忙立正答道：“我就是冯玉祥。”武汉国民政府要人和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参加北伐
左方是冯玉祥，右方是刘伯坚

冯商定，那天下午3点钟在郑州陇海花园开会议事。冯准时到场，看到议事桌上堆满了炮台纸烟和点心水果，而武汉政府的要人们，却姗姗来迟，直到5点钟才陆续来到。于是冯先生半开玩笑、半挖苦地写了一副对联，对联是这样写的：“3点钟开会，5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应该如此？一桌子水果，半桌子饼干，忘了前敌战士，饥饿未曾！”

1930年冯、阎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期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开府时代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率所部受冯节制，编为第八方面军，在京汉线上作战。樊钟秀的司令部设在许昌城内。一天，

冯由郑州乘火车赴许昌视察防务，樊钟秀在火车站迎候冯，冯的专车到站后，从一辆铁闷子车里下来一个农民装束的大汉，推着一辆上面放着两口袋粮食的手车，吱吱哼哼地进城去了，列车上的警卫部队下车后，也跟着进城去了。樊钟秀等候多时，老是不见冯下车，正在纳闷，车站上转来电话说，冯已经到了城内樊钟秀的司令部。原来那个推着一小车粮食的农民大汉，就是冯。

红 城

冯玉祥在苏联呆了半年多，接触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部队由绥远经宁夏、甘肃转进到西安。由于冯离开部队时，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其威望远逊于冯，以致西北军的诸将领各自为政，将帅不和，闹不团结；另一方面，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大军阀势力联合起来向西北军进攻，西北军寡不敌众，以致南口之战守了近半年，终于不免溃败。败退途中，将领灰心丧志，部众军纪废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几至不堪收拾。冯回国后，目睹这种状况，深感积重之后，非振之以猛、大加整顿一番不可。于是，他把大军云集西安，将其司令部设在旧皇城内，把旧皇城改名“红城”，皇城前面的广场，改名“红场”，红城、红场到处红旗飘扬。因此，张作霖、吴佩孚的部队对西北军作战时，命为“讨赤军”，说西北军“赤化”了。每天天蒙蒙亮，部队就在红场举行朝会。朝会由冯亲自主持，首先他亲自点高级将领的名，看他们是否有无故不到者，老将如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以及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都和士兵一样，大声应“有！”点过名，作提高士气的简短讲话。讲过话，就练习阅兵式和分列式。练阅兵式时，高级将领们和士兵一样地要行举手注目礼。练分列式时，高级将领们也和士兵们一样列队走正

步、向右看。有些老将，多时没有下过操了，乍一走路队，有的就走不对腿，有的还在“拉钻”。当分列式走到阅兵台前时，冯就向大伙问：“同志们辛苦了！”众齐答：“为革命服务！”又问：“你们是谁的队伍？”众齐答：“老百姓的队伍！”又问：“你们的任务是什么？”众齐答：“一、打倒帝国主义，二、铲除卖国军阀！”又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众齐答：“早就准备好了！”分列式举行完毕，接着开始各种操练，尤其着重战斗教练。每天进行三遍操练和两次学科；学科以政治教育为主。冯亲自主持的这种训练，对提高士气非常有益，官兵的头脑中只有一个意念，即救国救民，其他全不想了。每一个军在西安训练两星期就开走，开到潼关以东，开走一个军，又来一个军，各军全训练了一遍，冯就从西安移驻潼关，不久又移驻郑州。

在南京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冯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职，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张群、何应钦、吴铁城等设宴为之洗尘。筵席非常丰盛名贵，山珍海味无奇不有，中外名酒罗列俱全。宴会刚开始，冯张嘴大哭地说：“豫、陕、甘三省（包括青海、宁夏）的军民，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今天这样的酒菜饭食，我实在没法下咽。”接着他说了一声“谢谢”起身而去。蒋介石一伙东道主想不到遭此一场奚落，个个气得发昏，于是大骂冯是矫揉造作，不近人情。

冯在行政院大厦内办公，中午下班时别人都回宿舍吃饭去了，惟独冯却把饭菜用饭盒提到办公室，就在办公桌上吃午饭。有一天，中午下班时，院长谭延闿走得晚一些，冯要吃午饭了，就请谭延闿一起吃。谭延闿一看，主食是棒子面窝窝头，副食是

白菜豆腐和疙瘩头咸菜，他就说：“您请吧！”冯说：“我这种饭菜，恐怕您还没吃过的吧？在行政院大厦的办公室里，恐怕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饭菜吧！”据说，谭延闿这位大官僚，是最讲究吃喝的一个人，经常是鸡鱼肉蛋不离嘴，隔不了几天，就要吃一顿 60 两银子一盆的燕窝或鱼翅，这就难怪他咽不下棒子面窝窝和白菜豆腐疙瘩头了。谭延闿的厨师曹某，据说是全国最有名的厨师。可是，谭延闿终于死在这位曹厨师的手里了，传说是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曹厨师，把毒药下到食物内给毒死的。

1928 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各级官员的薪俸问题。有人提议，现任官和中央委员每人月薪应为银洋 800 元。恰好那天轮值的执行主席是冯，提议者发言后，冯就以执行主席的身份说话了。他说：“现在是战乱之后，民穷财尽，特别是豫、陕、甘一带，连年旱涝成灾，颗粒不收，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我们居上位者要拿那么多的钱，不顾人民的死活，于心何忍！”冯的话一落音，那位提议者和一些附议者，纷纷开腔了，他们说：“我们从广州出师北伐的时候，也曾光着脚板，穿着草鞋，茹苦含辛地什么罪都受过，什么苦都吃过，今天革命成功了，我们应该享受享受了，月薪 800 元并不算高。”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冯一味推托，就是不予表决，这一天过去。第二天，别人当了执行主席，提议月薪 800 元的人更多了，执行主席很快地付之表决，除冯和极少数几位委员反对外，绝大部分委员都是举手、鼓掌通过，而冯却气得顿足并立即退出会场，不再出席会议。

冯在南京时，南京市市长是刘纪文。刘是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期的军需处长，是蒋手下最红的一个。他当上了南京市长之后，炙手可热，骄奢淫逸，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市民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伸。冯到南京后，市民向他投告者，日不

暇接。当刘纪文和中央大学校花许淑珍结婚时，趋炎附势、乘机钻营者，纷纷馈送金银珍宝，作为贺礼。冯也不免俗，给刘纪文送了一个颇为精致的小匣子。刘纪文打开匣子看是什么贵重礼物，不看犹可，一看登时吓得面无血色，浑身打战。原来满匣子里面装的全是南京市民控告刘纪文种种罪行的状子。

主张公道

北伐战争结束后，全国实行编遣队伍，由蒋介石操纵的编遣会议，规定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缩编为 12 个师，冯的第二集团军也缩编为 12 个师，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缩编为 10 个师，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缩编为 8 个师。起初，冯、阎、李三位总司令对此还没有多大分歧意见。可是，除此之外，中央另有直辖骑兵若干师，炮兵若干团，工兵若干团，辎重兵若干团，通信兵若干团，宪兵若干团，合计起来超过了 12 个师，而所谓中央直辖，就是归蒋介石掌握。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四个集团军的零星杂牌部队，有编三个师、两个师或一个师的，合计起来又超过了 12 个师，而这些名义上归中央直辖的部队，实际上又都归入了蒋介石的掌握。这样，冯、阎、李三个总司令当然认为太不公道，太不合理了。不特如此，还有更不公道、更不合理的问题呢，那就是关于饷章问题。编遣会议规定，第一集团军的饷章比其他三个集团军的饷章要高一倍，理由是西北和广西地方苦寒，负担不起较多的钱粮，而这些地方的官兵、特别是西北军的官兵，过惯了艰苦生活，所以饷章要定得低一些，而江南一带比较富庶，官兵也习惯于较高生活，所以饷章要定得高一些。这算什么理由？冯、阎、李都愤愤不平，拒不接受，编遣会议遂告破裂。接着就是冯、阎、李三方联合起来，组织“护党救国军”，共同反蒋。他们的官兵左臂上都缀上一块八厘米见方、白布蓝

边、里边横书“主张公道”四个蓝色字的臂章。这是 1929 年的事。不过这一仗没打好，一因桂系方面距离太远，与冯、阎方面联系不上，不能密切配合作战；二因冯的主力部队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军，被蒋介石以重金和高官收买过去，冯不得不把在山东、河南的部队统统撤出潼关以西，休养生息。到 1930 年，冯、阎再次联合反蒋，打了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

奇 异 装 束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事会议，冯被邀，由山西赴南京参加会议。冯到南京时，穿的是蓝色粗布棉裤和短裕棉袄，腰里扎了一条蓝布腰带，头上戴了一顶毡帽。冯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常委李烈钧一见他这样打扮，认为太不合适，连夜替他赶制一套常礼服——蓝绸子长棉袍，黑缎子夹马褂，灰色细呢子礼帽。冯倒是没有拒绝，但他却把长袍的下半段给剪去了，只留到长及膝盖为止，说是下半段走起路碍事，没有用处，且是浪费。礼帽的边缘，除留前面的一部分外，其余部分也都剪去了，形成了一顶鸭舌帽。第二天，冯穿戴着这一套“礼服”去参加会议，会场上为之哄堂大笑。

在 泰 山

1932 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军兴，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政人员主和，与日军订立了《淞沪停战协定》，战事遂告结束。冯是主战派，但孤掌难鸣，其志未遂，不愿留在南京，准备仍回山西晋祠韬光养晦。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原是冯的部下，与冯有着几十年的患难之交，韩虽于 1929 年背叛冯，投靠蒋介石，而对冯的恩情不能忘怀；加之韩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又不愿受其挟

制，想要独霸山东。当他听到冯要回山西的消息后，遂想拥冯以自重，并借此以弥补叛冯的愆尤，于是，亲率钢甲火车前往徐州迎接冯，就这样，冯上了泰山，住在普照寺。

1933年长城抗战时，冯和吉鸿昌、方振武、任应岐等将领，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和日军作战，取得不小胜利。但蒋介石同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并同日军一起，派出大军进逼冯解散民众抗日同盟军，且将吉鸿昌、方振武、任应岐等加以杀害。韩复榘再次亲率钢甲火车，第二次把冯迎上泰山。

冯在泰山时，担任警卫的有一个手枪团。这个手枪团都是跟随冯多年而不愿离开冯的各级军官所组成。他们的粮饷，是由韩复榘和宋哲元分别承担的。这个手枪团，日常除操课训练外，冯经常领导着他们从事生产建设。普照寺位于泰山南麓，寺前是一片乱石岗，冯就把那一片上百亩的乱石岗开成一个林果园，聘请专家指导，引进良种，栽种苹果。泰山出产苹果，即从此始。泰安的“金帅”苹果，誉满中外，大量出口。

泰山有三溪，普照寺的西侧是西溪，西溪之西有疗养院、休养所、医院等许多机关，只因隔着一条溪沟，交通极不方便。于是冯督饬着他的手枪团，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坚固耐久的石砌铁架桥，冯亲笔题字镌石，取名为“大众桥”。这座桥，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成了泰山上的一个古迹名胜了。

冯虽然避开尘嚣，居住山寺，而南来北往路过泰安的军政要员，登山拜访冯并顺便游览一下泰山景色者，还是颇不乏人。有一天，铁道部部长、太子孙科，前来看望冯，冯亲自导游，从上午10点一直游览到下午4点，当然既不是骑马，也不是坐轿，更非乘车，只是步行，把孙科累得直不起腰来，满头大汗，渴得口内生烟，饿得头晕眼花。回到普照寺，先喝点茶水，歇息了一

会，开饭了，都是不冷不热的小米绿豆稀饭，刚掀开笼格冒着热气的棒子面窝窝头和一盆清汤豆腐白菜。孙科馋涎欲滴，喝着小米粥比牛奶还香甜，吃着窝窝头比面包夹火腿还好吃，就着白菜豆腐比山珍海味还要鲜。于是孙科狼吞虎咽地喝了两大碗稀饭，吃了两个大窝窝，豆腐白菜连汤都喝了。冯还一个劲地介绍说：“泰山有三美，白菜、豆腐、水。”孙科吃饱喝足之后说：“冯先生的饭菜太好了！今天这顿饭，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得这么多，这么饱。我在南京，成天吃的是西餐、大菜，鸡鸭燕翅，可是每餐吃的数量，不及今天这顿饭的十分之一，这是怎么回事呢？”冯说：“你在南京养尊处优，一天到晚坐着躺着，一动就是汽车，一步也没走过，一天吃上五六顿饭，上顿饭还在喉咙眼里，下顿饭可又端上来了，根本不饿，再好的饭菜，一看就腻，怎么能吃得下呢？饥者甘食，渴者甘饮；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此之谓乎？”

“倒戈将军”

辛亥革命时，冯当营长，他同王金铭、施从云两营长共同发动滦州起义，准备进攻北京，推翻清王朝；1916年袁世凯称帝，蔡松坡由滇入川讨伐，袁世凯的干儿子、四川都督陈宦，命冯率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在宜宾迎击滇军，而冯却派参谋长张之江赴纳溪与蔡松坡谈判，为输诚佯装战败，十六混成旅由宜宾退到成都。冯力逼陈宦发出四川独立、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通电，这个通电成了袁世凯的催命符，不久袁便死去。1917年，冯反对内战，停兵浦口，拒不援闽；1918年，冯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内战；1920年，直、皖战争时，曹、吴命令冯率部参战，冯借故拖延，迟迟不行，未及开到战场，战事已告结束；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时，冯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不久，又和

张作霖火并，并和段祺瑞闹翻；1929年冯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组织“护党救国军”，共同倒蒋；1930年，冯又联合阎锡山，发动了反蒋的中原大战。基于上述一系列的史实，有人称冯为“倒戈将军”。其实，冯之所以不听这个，不听那个，打这个，打那个，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正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正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进；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冯常常引用陶渊明的话“觉今是而昨非”。冯还常说：“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冯的所谓倒戈，大概就是基于这种哲理而行事的吧。

日 记

冯自当旅长起，天天记日记，没有间断过，无论多么忙，深夜也得把当天的日记记下来，或者次日早早起来把头一天的日记补记下来。如果一天的日记没有记，就书一“死”字以代之。日记的记载范围很广泛，举凡工作，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会客：会的是谁，谈了些什么事；读书：读了什么，有什么心得体会；看操：看的哪些单位，操练的什么；视察：视察了什么，发现了什么问题；以及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观感，等等。有时把作的诗歌也记在日记里。1930年秋，冯、阎联合反蒋中原大战之时，冯的日记已印制成书，平装，书皮是草绿色的，封面上写着《冯玉祥日记》。当时，西北军的连长以上各级军官每人发给一本。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日记》一度公开发行，书皮是白色的，其内容比前次出版的抽掉了许多。大概是因为冯当时与蒋介石合作共同抗日的关系吧，凡是日记里面有关反蒋的段落，完全给删去了，已非庐山真面目，失去了真实的历史价值。

半拉脸丢掉了

抗日战争初期，冯玉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受其指挥的部队，主要是宋哲元的西北军旧部和刘峙的中央军嫡系。宋哲元部已不像从前那样恪遵冯的命令了，而刘峙所部更是不听冯的那一套，因而宋部不战而退，刘部一泻千里，华北大片土地很快地沦入敌手。冯见事不可为，遂辞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不久，冯又代蒋介石任上海一带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这一战区的作战部队，完全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冯更是指挥不灵，处处掣肘，对于不听命令或作战不力者，由于蒋介石的包庇，亦无可如何，于是只好又辞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又不久，津浦铁路北段战争吃紧，成立第六战区，这一战区的作战部队，主要是韩复榘的西北军旧部，冯又被任命为这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冯乘火车赴济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到车站去迎接，冯下车时，用手捂住半拉脸，韩复榘问道：“先生的脸怎么了？”冯说：“我这半拉脸被宋哲元给丢掉了，剩下的半拉脸，就看你争气不争气了！”结果，韩复榘更是不争气，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甚至不战而退，终至被蒋介石借口处死，第六战区被撤消。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把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予以逮捕，并宣布四大罪状：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保存实力，拥兵自卫；收拦民枪；贩卖鸦片。韩复榘被扣押到武汉后，蒋介石本已拿定主意把他处死，但他却给人以假象，说是要让韩复榘出洋，何应钦拿着为韩复榘办的出国护照，假惺惺地向冯征求意见。冯沉闷了半晌，猜透了蒋介石的用心，是想把该杀而不让杀的骂名诿之

于冯。于是冯先生提笔写了八个大字：“爱国者友，害国者仇”，别的什么话也没说。结果，蒋介石把韩复榘枪毙了。

在陆大上学

抗日战争初期，冯先后担任三个战区司令长官，由于事权不一，指挥系统紊乱，都未能展其抱负，发挥其应有作用。他鉴于抗日战争不是短期所能结束，乃要求训练新兵，编练部队。冯为了将来指挥作战能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运用灵活，建议由他自己选西北军旧部为骨干，成立三个军，并提出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任军长。蒋介石表面上答应，并批交军政部长何应钦照拨新兵，照发武器装备和经费。而实际上蒋介石和何应钦玩的是双簧把戏，何连一个新兵也不拨给，一支枪、一元钱也不给发。冯无可奈何，只好作罢。闲着无所事事，冯做了一段时间的献金救国运动工作，随后偕同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以备来日更好地为国效力。

陆大校长是由蒋介石兼任，但只是一个挂名，实际负责的是教育长。当时的教育长是杨杰（耿光）。由于冯是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带职学习，所以杨杰一遇着他，总是抢先向他敬礼，并向他请示报告；而冯每逢遇着杨杰，也总是抢先向他敬礼，这样，两人都是感觉不好意思。后来，冯提出一个两全办法，他对杨杰说：“在校外相遇时，你是教育长，我是副委员长，你是下级，我是上级，你须先向我敬礼；一进陆大校门，你是教育长，我是学员，你是上级，我是下级，我须先向你敬礼。”以后他们两人就是照此协议行事。

冯在陆大学习期间，非常认真，非常用功，无故从不缺课，听讲、作业从不马虎，尤其是战术作业，写字是楷书，画图是工

笔，一丝不苟，非常细致，所得成绩总是优良。但是，他的作业，很少发还到他手里，都被教官们和同学们拿去作纪念品了。

西北军的带兵军官，大多数是行伍出身，而其幕僚人员如各级参谋长、参谋、团附等，不是陆大出身，便是国内外军官学生出身。行伍出身的带兵军官，也不全是老粗，韩复榘就是司书生出身。他当团长时，还上过相当于陆大的高级教导团。1925年，冯在张家口办了一所“西北干部学校”，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选拔文化程度较高的初级军官和上兵，大部分是从京、津一带招收的大、中学生。在这所学校里，还选派了二三百学员，分别留日、留德、留俄，去学习各兵科军事学。1928至1930年间，冯还在开封、洛阳举办过西北军军官学校。

在陆大讲演

陆军大学的校址，最早在北京，国民党当政时期迁到南京，抗日战争初期迁到湖南桃源，以后迁到贵州遵义，1940年夏又迁到重庆。迁到重庆后，正值将官班第一期（笔者就在这个班学习）和特别班第四期将要毕业，学校当局特邀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如孔祥熙、张群、于右任、王宠惠、李济琛、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冯玉祥等轮流到校讲话。一天，轮到了冯，别人来时，都是把讲稿放在皮包里提着来，而冯却用一块蓝粗布、白印花，好似农村妇女的顶头手巾，包着讲稿，挟在胳肢窝里而来。一开头，他说：“陆军大学校是最高军事学府，而我是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我向你们大家讲话，简直是鲁班门前耍锯、孔夫子门前卖文了。你们成天学的是高级战略、大军战术，我要再对你们讲这一套，那就好比刚吃罢丰盛的酒席，再让你们吃红烧肉，你们会感到很腻歪而吃不下去的，因此，今天我不准备讲那些高深的军事理论，而给大家弄点小菜来解解油腻。”接着他就讲开他那

所谓“小菜”的正题。他说，练兵最要紧的是，要让士兵练“咯吧死”，就是要多练瞄准，多练实弹射击。瞄准了，这边把扳机一拨，咯吧一响，那边的敌人应声而倒，这比练什么都要紧。接着他说，对士兵讲战术，必须讲得越通俗越好，深了他们听不懂。什么是战术？卖柴的老张和卖菜的老王，两人都担着挑子上街去赶集，街上路窄人多，老张的柴禾挑子，碰撒了老王的青菜挑子，两人争吵相持不下，于是动手打起来了。卖菜的老王先用拳头照着卖柴的老张的头部一晃，老张只顾招架头部，冷不防老王从底下来了个“扫堂腿”，一下子把老张给摔了个嘴啃泥。这就是出其不意、声东击西的战术。而我们的指挥官，尤其是连、排长们，就不懂这一招，他们是“袖筒里装棒槌——直进直出”，那怎么能取胜呢？冯讲了一个半小时，让大家休息一刻钟。别的要员们在休息时，都是到贵宾休息室里吸烟吃茶，而冯却在院中一棵大树底下就地盘腿坐下，同围上来的学员们有说有笑地攀谈起来。下半段的时间，冯不再弄小菜吃了，而是端出山珍海味来了。他从上古直至近代的兵书如《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繚子》、《吴子六篇》、《孙子十三篇》、《李卫公问对》、《纪效新书》、《拿破仑战史》和《克罗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等。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讲了两个小时。大家听得出神，一点也不感到腻歪，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在这以前，没有见过和不了解冯的人们，都以为冯是一个黑旋风李逵式的粗人，及至这次见了和听了他的讲演，才知道冯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慈 祥 长 者

1938年3月17日，笔者在抗日战争滕县守城战役中，被敌人炮弹炸伤腿脚，先到汉口法国教会梅神父医院动手术，后转成都后方医院治疗。1939年1月11日，冯由重庆赴成都开展献金

救国运动，他住到陕西街刘文辉的宅子里。第二天一早，我去看他，我知道冯向来是起床很早的，于是凌晨4点我就拄着双拐去了。一到他那住所大门外，就看到随他来的手枪队，正在劈刀、打拳、练武术。到了二门，看见他的卫士们正在吃早饭。到了内厅，看见冯正在灯下写什么。我把名片（当时我是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四旅少将旅长）交给他的副官呈上，冯立即走出厅房相迎。他看见我拄着双拐，连忙伸手搀扶住我，进到厅里，让我坐下以后说：“天这么冷，你出门怎么不穿大衣？”我答：“本来穿着哩，穿着大衣进谒老长官不恭敬，脱在门房里了。”他“嗨”了一声说：“你不怕冻着吗？快拿来穿上！”副官拿来之后，他亲手给我披上说：“你是在滕县受的伤？”我说：“是的，先生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受了伤，到武汉来就医，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不怕我挂念？”我说：“先生日理万机，事情那么繁忙，我怎好再干扰先生呢？所以未向先生报告。”他说：“我还是听到王丕襄说，才知道你在滕县受伤，到汉口梅神父医院治疗。于是那天我就同王丕襄一道从武昌过江去看你，并且还给你带了东西（一百多本书，大部分是冯的著作），谁知你在头一天乘飞机到成都去了。现在伤势怎么样了？伤在哪儿？我看看。”于是我解开绑腿，脱下鞋袜，冯用手在伤处摸摸捏捏，说：“伤势很重，治疗得很好，若是把腿锯断，脚锯掉，那才糟糕呢，你还须好好休养，不要急着回部队去。”冯接着问我：“你还有哪里受过伤？”1927年8月26日，在北伐战争时，我在陕西同州攻城战中，敌弹贯穿右肺，几濒于死。冯命我解开上衣，亲手摸着前后弹着伤痕说：“噢！这是致命伤啊！现在怎样？有后遗症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好，那好！”冯又问，还有哪儿受过伤？我说，一处在腋下，一处在腕上，都是轻伤，没让他再看。随后，我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写点什么，以便遵循并作纪念？”冯问

我带笔记本没有，我忘带了，我说：“回头送来吧。”我买了两张宣纸，钉成一个16开的本子送去。冯写的是寸楷隶书，内容如下：“带兵之道，须如父兄之待子弟，饥为之食，寒为之衣，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大公无私。练兵之道，必以身先之劳之；言教不如身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用兵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随机应变，坚定果决，出奇制胜，兵贵神速，巧迟不如拙速。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当时笔者的父母和张维玺、王恒心的父亲，都在成都寓居，他们在过去都和冯见过面，这次他们也去看望了冯，冯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随后，冯还派副官拿着他的名片、带着礼物，回拜了三位老人家。

1940年夏，笔者在重庆于陆大即将毕业时，抽空又去进谒冯，一见面，冯就说：“好啊！你把双拐撂下了，腿脚的伤都好利落了？”我答：“不拄拐棍能以行动了，只是还不能走远路。”冯说：“多坐车或多骑马，不要步行走远路。让我再看看伤势长得怎么样？”头天晚上我没有洗脚，不好意思脱袜子，我就说：“已经长好了，先生很忙，不必看了。”冯说：“我不放心，我得看看。”我只好把裤腿撙起，把袜子脱掉，冯一点也不嫌脚脏、脚臭，把伤处抚摸过来，抚摸过去，嘴里还说着：“骨头接合得还不错。但是，还须休养一段时间，才能重返沙场。”随后，冯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我。上联是：“项羽破釜沉舟，立夺秦关百二；”下联是：“勾践卧薪尝胆，终吞吴地三千。”我感到他真是一位慈祥长者。

义务保长

从1941年起，日军更加疯狂地轰炸重庆，每批敌机少则三五十架，多则百余架，一批刚去，一批又来，夜以继日，连续不

断地进行狂轰滥炸。重庆市区不能安居，许多政府机关及其所属职工家属纷纷迁居到距市区三四十里的西郊歌乐山一带。冯玉祥也由市区移到这里。政府官员的家属，自以为特权阶层，不受当地地方政权的约束，抗粮、抗税，抗捐，拒服兵役，并且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当地小民百姓愤愤不平，乡、保长们不敢过问。冯察悉这种情况后，挺身而出，充当义务保长。他把情况调查清楚之后，该纳粮的纳粮，该纳税的纳税，该认捐的认捐，该服兵役的服兵役，谁也逃避不了，谁也不能例外，铁面无私，毫不徇情。那些特权阶层敢怒而不敢言，而当地的小民百姓如乡、保长们，却是拍手称快，称他为“冯保长”。

穷人饭店

冯住到歌乐山，目睹肩挑小贩、升斗小民和来往客商，路过歌乐山一带时，住不起高级旅馆，吃不起昂贵酒饭，于是乎他就在歌乐山下交通要道上的陈家桥，开设了一座竹篱茅舍的“穷人饭店”。主食有大米蒸饭、稀饭和窝窝头，副食有萝卜、白菜和泡菜。住宿则是地铺，下面是一尺多厚的干稻草，上面夏覆竹席，冬覆毛毡，价钱非常便宜。因为饭店里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是由冯的警卫部队中抽调来的，不赚分毫利润。因此，过往穷人无不称便。事为重庆市政当局获悉，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来调查这个“穷人饭店”，吹毛求疵地察看之后，下了“卫生很好，营养不足”八个字的结论。人们不禁问道：哪里穷人们的营养是足的呢？在旧中国，穷人们能免于饥饿而死，就算是幸福无边了啊！

在美国

冯竭力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联合各党各派，共同建设

祖国，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和法西斯独裁专制。但是，忠言逆耳，蒋介石对于冯的劝告是听不入耳的。1946年6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掀起全面内战。冯看透了鸟兽不可与同群，也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久就要崩溃垮台，遂即要求出国，并准备绕道到解放区去。蒋介石已巴不得冯赶快离开，以免在他身边碍手碍脚，遂即给了冯一个考察欧美水利专使的名义，冯于1946年9月到了美国。

1965年夏，笔者在青岛疗养院疗养时，正值冯夫人、卫生部李德全部长到青岛度假，有一天我去看望她，承她告诉我冯先生在美国进行反蒋活动的一些情况。李说，冯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正是由杜鲁门总统执政。他的政府是支持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它不仅以经济援助蒋介石，而且还以军事援助蒋介石。因此，冯在美国遂即进行反对美国援蒋的运动。1947年“双十节”（当时的国庆节）那天晚上，中国留美学生会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庆祝会，特约冯去讲话。冯在会上大声疾呼、义正辞严地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并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媚外卖国。他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说：蒋介石在中国屠杀了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和老百姓，因此，可以说蒋介石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蒋介石又是一个运输大队长，因为美国送给他的坦克、大炮和枪支弹药，都被他输送给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了……就在庆祝“双十节”那天，冯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说，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和反对美国政府支援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内战的立场。有一个美国记者问他：“冯先生你这样讲话，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冯回答说：“我如果怕他谋害，我就不这样讲了，我就不反蒋了。”冯在美国公开反对蒋介石，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他立即解除了冯的考察欧美水利专使的名义；不久，又

开除了冯的国民党党籍。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被推为该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有人问冯，对蒋介石处理这两件事的感想怎么样，冯一笑置之说，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冯的留美护照有效期满，回到祖国解放区，遂于1948年8月离开美国。

遇 难

冯玉祥遇难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死因如何，传说不一，有的说是蒋介石的特务害的，有的说是轮船失火烧的。1948年9月8日新华社自陕北公布的这一消息照录于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据苏联塔斯社敖德萨4日电称：“胜利”汽船8月初离开纽约驶敖德萨。在开罗时有两千多名要到巴统的被遣送回国的阿美尼亚人上船。8月31日“胜利”号船已由巴统启航来敖德萨，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遭难者中，有中国冯玉祥将军及其女儿。该船已抵敖德萨，正进行调查中。又据塔斯社莫斯科7日电称：在“胜利”号轮船因着火遇难的冯玉祥将军灵柩，已于9月7日由飞机运抵莫斯科，遵照冯夫人的愿望，将其遗体焚化，骨灰罐将交给冯夫人。火葬时到场的有冯将军的亲戚、苏联武装部队及公共团体的代表。当将军的灵柩抵达机场及火葬场时，曾致以军礼辞灵。

1965年夏，笔者在青岛会见李德全部长时，承她详述冯先生遇难的经过如下：冯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在乘苏联“胜利”号轮船离开美国时，曾扬言到开罗居留一个时期。船抵开罗，冯一行下船住下，特务们也下了船，当“胜利”号轮船由开罗启碇时，冯一行情悄地上了船，那帮特务们既无赴苏船票，又无赴苏入境签证，他们上不去“胜利”号，

从此才把那帮特务甩开了。1948年8月31日船抵黑海，晚餐后，冯氏一家和部分其他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亲自动手放映他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脱，旋转速度太快，摩擦生电，以致起火，电影室内存放着影片拷贝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蔓延迅速，一霎那间，满室是火，瓦斯气味令人窒息，冯和其他观众，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但是到处烟雾迷漫，找不到出路。冯问他家人失散了，他自己左右冲突，先到左边通道，找不着出路，后到右边通道，还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倒在一个楼梯下面，及至烟消雾散，家人找到他时，他已被窒息气绝身亡。他的幼女冯晓达同时遇难（李德全夫人生三女一男：长女名理达，次女名颖达，三女名晓达，男名洪达）。李德全夫人亦被烧伤甚重，当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还在昏迷状态中。船上其他乘客同时遇难者有七十多人。当火灾发生时，“胜利”号船发出求救信号，附近停有两艘苏联军舰，闻警赶至，立即把冯先生的遗体和他的一家以及其他乘客全部救出。冯的遗体在敖德萨装殓后，连同他的家人用飞机运到莫斯科。

荣 哀

冯玉祥的死讯传出后，1948年7月8日新华社陕北电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顷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吊唁冯氏之丧，原电如下：

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

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不胜震悼。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特电致唁，并申哀悼。

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

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致力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同志亦曾致电吊唁，原电如下：

冯夫人：

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忱。

冯夫人李德全的灼伤痊愈后，携着冯先生的骨灰罐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李德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她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北京为冯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亲笔为他写了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按照冯的生前愿望，在泰山西麓、普照寺西侧、大众桥的东端为他修建了陵墓。陵园依山而建，成一半圆开，墓碑高约5米，宽约20米，以白色花岗石砌成，具有民族风格。墓碑正面上方，镌刻着郭沫若所题“冯玉祥先生之墓”的斗大金字。墓碑正中悬挂着冯先生的侧面人头铜像，铜像背后就是墓穴，里面安放着冯先生的骨灰罐。铜像下面，挂着一块约50厘米见方的铜质铭牌，上面镌刻着冯先生生前自作自书寸楷隶字的铭文：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齐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冯玉祥

一九四〇年五月卅一日作

冯玉祥的陵园，紧靠着大众桥的东端，陵园的正门是一座华表

柱的青石牌坊。进了牌坊是白色花岗石的台阶，台阶分三层，每层22级，共66级而达墓前。冯先生终年66周岁，台阶66级，正是死其年龄之数。1952年10月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了冯玉祥先生安葬仪式。现在冯的陵园和大众桥，都已成了泰山上的名胜古迹了。

致李济深的信

1948年9月19日新华社陕北电，据国外消息报导：已故的冯玉祥将军曾勇敢地拒绝了美帝国主义破坏中国人民民主阵线的诡计，并遭受了中、美反动派的联合压迫。本月11日香港《远东汇报》刊载，冯氏8月12日致李济深的信称：冯氏留居美国时，美国政府官员曾向他表示，只要中国反蒋的派别抛弃与共产党联合的立场，美国政府便会抛弃蒋介石，而以充足的军火与金钱支持他们。该美国官员给他们6个月的时间考虑此事。但冯氏立即作了答复，拒绝了这个卑鄙的提议。美国反动派在实行利诱的同时，向冯氏实行了威胁。冯氏在感觉到美国的环境恶劣时，决心回到祖国来从事有效的奋斗。冯氏在上述的信中说：最后的里程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护照期已满。冯氏谴责蒋介石与美国反动派企图颠覆他的计划：“他们与国会里的恶棍楚德和鲁期联合成一气，一有可能就痛骂我。”前美国内政部的伊克斯于本月8日著文称：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同样残酷的独裁者蒋介石，曾在美国官方显然的允许甚至帮助之下，派遣他的鹰犬追逐冯氏。冯氏有理由猜疑他在这里是不安全的，所以他悄悄地动身到另外一块土地上去，他希望能够在那块土地上找到较大的安全，以免遭到暗杀的可能。

论 定

1948年9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冯玉祥的略历，原电如下：

冯玉祥，字焕章，六十八岁（1882—1948年实际六十六周岁），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自幼入伍，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督军等职。曾参加辛亥革命、讨伐张勋等役。一九二四年冬成立了国民军，任总司令。一九二六年去苏联，九月返国，直至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前，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帮助了陕西等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其后曾经一度脱离革命阵营，但受到蒋介石排斥。一九三三年五月组织察北抗日同盟军，亦因蒋介石的破坏而失败。一九三五年冬任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迄无实权，后因主张与蒋介石不合，被去职。一九四六年九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被蒋介石遣往美国。冯在美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却很自然地受到蒋介石匪帮的痛恨，被撤销了专使的名义，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今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被选为该会的政治委员会主席。今年八月离美返国，八月三十一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

（张宣武）